

第十二章 对亚洲国家工业化实践的总结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亚洲以其群体性高增长的特征著称于世，尤其是亚洲长期采取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路径，被古典经济学奉为获取经济发展成功的实践典型。自20世纪60年代起，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路径相继被亚洲后起国家采纳，在亚洲地区已推行半个多世纪之久。该路径的最大成功之处在于促使亚洲区内生产与区外消费完美结合，使得推行这一发展战略的亚洲国家相继实现了人均收入的快速提升，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增长奇迹”。

尽管亚洲工业化路径有助于缓解后起国家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面临的国内市场狭小的难题，但是其缺点也不言自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失去了工业化进程的自主性，特别是在外部市场需求约束增强的时候，后起国家不可避免地要被牵连其中。同时，当更多的后起国家相继走上同一条工业化路径之后，其“合成谬误”的存在导致该路径的有效性也开始遭到更多的质疑。

进入后危机时代，亚洲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路径仍具有可持续性，但是其作用会有所弱化，同时内需将成为亚洲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也就是说，亚洲国家普遍出现内外需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趋势，更为突出的是此次路径转型主要依靠亚洲国家自我力量实现。

亚洲国家工业化的丰富实践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化理论的正确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不发达国家或地区实现工业化的理论内涵，即市场始终是不发达国家或地区实现工业化面临的主要难题，决定了一国或一地区工业化进程的快慢，同时，政府的有效作为是缩减与发达国家工业化水平差距的重要前提，以上为其他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实践提供了理论价值和应用意义。

第一节 亚洲国家工业化路径的转轨

亚洲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路径在面临外部市场约束时能否持续，是否有可能发生变化，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一 对亚洲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路径的争论

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人们对亚洲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路径的可持续性产生了较大的争议。最直接的质疑是市场容量问题。亚洲后起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东盟主要成员和中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直接受益者，亚洲奇迹应该是这一模式有效性的最好证明。但是这一模式存在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需要有一个能不断扩张的外部市场。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Cline^①就对国际市场需求约束——主要是发达国家市场需求约束的负面影响进行过实证分析。Klein^②也注意到，如果发达国家市场被充分挖掘，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将越来越难以被发展中国家作为增长的主要路径所采用。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有关世界市场——主要是发达国家市场规模与诸多采用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出口之间的矛盾以“合成谬误”的形式更为人们所关注。所谓的“合成谬误”，是指当众多发展中国家都采用同一增长模式时，由于受到市场需求规模的制约而导致采用这一模式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失败。一些学者利用经验数据证明了“合成谬误”的存在^③。张亚斌等基于42个发展中国家1995—2007年跨国面板数据的广义矩估计，经验支持了“合成谬误”趋势的存在，在“合成谬误”存在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亟待调整，发展

① Cline, William R., "Can the East Asian Model of Development be Generalized?", *World Development*, 1982, Vol. 24.

② Klein, Lawrence R., "Can Export - Led Growth Continue Indefinitely? An Asia - Pacific Perspective",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1990, No. 1, pp. 1 - 12.

③ Faini R., Clavijo F., and Senhadji - Semlali A., "The fallacy of composition argument: Is it relevant for LDCs manufactures export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2, Vol. 36, No. 4, pp. 865 - 882. Martin Will, "The Fallacy of Composition and Developing Country Exports of Manufactures", *The World Economy*, 1993, Vol. 16, No. 2, pp. 159 - 172. Razmi, A. and R. Blecker, "Developing Country Exports of Manufactures: Moving Up the Ladder to Escape the Fallacy of Composition?",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8, Vol. 44, No. 1, pp. 21 - 48.

中国家需实施外需与内需相协调的均衡发展。

针对“合成谬误”问题，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解决的途径。Blecker^①认为，三点原因缓解了“合成谬误”发生的严重性，即亚洲出口导向型政策是非同步、多样的；并非所有的亚洲出口都定位于发达国家，实际上亚洲区内贸易也在增长，部分替代了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全球制成品进口市场是动态变化的。

国内外对中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可持续性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国内部分学者对中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所持的态度随着时间推移而趋向否定。在承认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带来实际利益的同时，^②也指出该模式的弊端，主要是推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带来的“成本”过高，包括经济成本、^③社会成本、政策成本、环境资源成本^④等，为此，较一致的呼声是至少要推行一种平衡的贸易战略，以缓解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带来的种种压力。早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前后，国内学者就提出了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的调整方向。赵陵等^⑤认为，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同时，应更多地

① Blecker, R.,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 constrained Growth Model and the Limits to Export – Led Growth”. In P. Davidson, ed., *A Post Keynesian Perspective on Twenty – First Century Economic Problems*.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2002. Blecker, R., *The Diminishing Returns to Export – Led Growth*. In W. R. Mead and S. R. Schwenninger, eds., *The Bridge to a Global Middle Class: Development,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e in the 21st Century*. Norwell, MA: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for the Milken Institute, 2003.

② 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带来的实际利益主要有引入外部竞争压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引进技术和提高管理效率、产生规模效应，等等。

③ 张捷和张媛媛（2011）通过研究发现，广东产业结构演变趋于停滞，其原因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有利于促进工业化进程，却不利于广东实现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型升级。刘书瀚等（2011）认为，出口导向型经济造成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终结出口导向型经济有利于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杨先明等（2007）认为，随着劳动力等要素价格的上升，以低成本要素价格为基础的粗放型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难以持续。参见刘书瀚、贾根良、刘小军《出口导向型经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落后的根源与对策》，《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3期，第138—145页；杨先明、黄宁、李娅《收入挤压、农民工短缺与出口导向增长方式转型》，《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83—90页；张捷、张媛媛《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广东省为例》，《学术研究》2011年第7期，第75—80页；李晓、付竞卉《中国作为东亚市场提供者的现状与前景》，《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2期，第17—28页。

④ 参见卢映西《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已不可持续——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的理论反思》，《海派经济学》2009年第10期，第80—91页。

⑤ 参见赵陵、宋少华、宋泓明《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经验分析》，《世界经济》2011年第8期，第14—20页。

关注国内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顾秉维^①和李科^②认为，由于我国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赖以成功的国际经济关系背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我国应放弃单纯的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而采取一种基于大国规模背景的、开放式的平衡贸易战略。李计广和桑百川^③也认为，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已不能适应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我国应实行包括国际规范的政策措施在内的中性贸易战略。“中国2007年投入产出表分析应用”课题组^④认为，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在资源与收入分配方面面临可持续发展的挑战，有必要主动利用国家政策介入收入分配调整，改变出口导向模式不可持续的发展路径，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还有的国内学者^⑤直接提出放弃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大力启动消费，将经济可持续增长放在国内消费有效增长的基础上。

也有学者认为扩大内需与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并不矛盾，不一定要在依赖内需时放弃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林毅夫和李永军^⑥认为，扩大内需与对外贸易政策并不矛盾，关键是对外贸易的发展能否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来调整产业结构。李春顶^⑦认为，与国内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比，出口仍然较为逊色，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外贸依存度并没有想象中那样过高而存在安全性问题，不会制约我国经济的未来发展。

还有的学者则进一步认为，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具有可持续性。其原因在于从国际角度看，国际产业转移不会停止^⑧；从国

① 参见顾秉维《从出口导向型到大国经济——试论我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的贸易战略选择》，《上海经济研究》1998年第4期，第17—20页。

② 参见李科《出口导向战略还能走多远——浅析我国贸易战略的新选择》，《改革与战略》1999年第4期，第44—47页。

③ 参见李计广、桑百川《“出口导向”贸易战略回眸与下一步“中性”贸易战略的提出》，《改革》2008年第4期，第104—110页。

④ 参见中国2007年投入产出表分析应用课题组《出口导向经济模式的形成、问题与前景》，《统计研究》2011年第2期，第3—6页。

⑤ 参见陈传兴《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战略性调整》，《国际贸易》2007年第9期，第22—26页；魏杰《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与投资拉动型增长方式都不可取》，《理论前沿》2009年第5期，第28—29页。

⑥ 参见林毅夫、李永军《出口与中国的经济增长：需求导向的分析》，《经济学》2003年第4期，第779—794页。

⑦ 参见李春顶《出口与增长：中国三十年经验实证（1978—2008）》，《财经科学》2009年第5期，第117—124页。

⑧ 参见潘悦《国际产业转移的四次浪潮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4期，第23—27页。

内角度看,中国出口导向增长模式是由中国低人口抚养率和低城市化率共同决定的,这导致了国内市场扩张慢,市场出清的唯一途径就是出口,因此中国出口导向型模式还将持续^①;从国内外综合角度看,中国出口导向型模式的形成是产业结构国际梯度转移和产品价值增值环节国际梯度转移与中国特有的劳动要素禀赋相耦合的必然结果,在后危机时代,这些决定性因素依然长期存在,中国在后危机时代继续奉行出口导向型战略,不仅必要,而且可行^②。

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调整的手段之一是发展南南贸易。张亚斌和车鸣^③提出,降低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结构相似度,积极拓展南南贸易,实现中国对外市场多元化。

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很容易因其出口规模过大而对世界市场产生较大的压力,同时也对其他发展中经济体采用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带来一定的压力,自然国外对中国采用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给予了更多的关注。Guo 和 N. Diaye^④对中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进行中长期评估后认为,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取决于一国可能占有的世界市场份额,必要的调整是转向私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和减少对外部市场的需要。

还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外贸扩张对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提供了新的贸易机会。Sanjaya 和 Manuel^⑤在考察中国对东亚地区的出口影响之后认为,中国与地区贸易的关系是互补而非对立,中国正在起促进地区出口增长的发动机作用。Park 和 Shin^⑥发现,虽然中国还不是东亚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是中国从东亚进口的最终产品份额在上升,进口的零部件份额在下降,这表明中国正在成为地区的消费者,而不再是单纯的生产者,与中国开展

① 参见姚洋、余森杰《劳动力、人口和中国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金融研究》2009年第9期,第1—13页。

② 参见戴翔《中国“出口导向型”模式的可持续性辨析》,《现代经济探讨》2010年第8期,第83—87页。

③ 参见张亚斌、车鸣《出口导向增长、需求约束与“合成谬误”》,《东南学术》2011年第5期,第58—65页。

④ Kai Guo, Papa N. Diaye, “Is China’s Export—Oriented Growth Sustainable?”, *IMF Working Paper*, 2009, No. 172.

⑤ Lall Sanjaya, Albaladejo Manuel, “China’s Competitive Performance: A Threat to East Asian Manufactured Exports?”, *World Development*, 2004, Vol. 32, No. 9, pp. 1441—1466.

⑥ Donghyun Park, Kwanho Shin, “Can Trade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 an Engine of Growth for Developing Asi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2009, No. 172.

贸易在短期内可以抵御外部需求减少的冲击，在长期，可以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

也有学者认为，亚洲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仍具有可持续性。Felipe^①认为，由于经济规模的原因，该模式对多数亚洲发展中国家仍是最好的政策选择。

由于亚洲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面临日益增强的区外市场约束，人们提出了倾向于内需主导型增长模式的政策选择。Palley^②认为，多数亚洲国家采取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已经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如阻碍了国内市场的发育、使自身置于低端竞争平台上、造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就业冲突、由于过度投资强化了出口导向型增长和金融不稳定之间的联系、恶化了发展中国家的长期贸易条件、强化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市场依赖，等等，因而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不再是亚洲国家的最优增长模式，需要采用新的基于内需的增长模式。Akyüz^③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亚洲对发达国家出口的高度依赖，未来一定时期内，由于发达国家经济缓慢增长和高失业率，该地区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的出口高增长时代，这需要亚洲国家再平衡国内和外部的需求，同时从出口导向转向国内市场和区内贸易，以启动产业重构。William等^④认为，外部需求难以继续支持亚洲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亚洲需要通过消费、基础设施投资和改善健康和社会安全网等建设使其增长转向依赖区内需求，以缓解外需衰退带来的压力，该文的观点被亚洲开发银行2009年展望报告所采用。^⑤

① Jesus Felipe, Joseph Lim, “Export or Domestic – Led Growth in Asi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ERD Working Paper*, 2005, No. 69.

② Palley, T. I., “A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Domestic Demand – Led Growth. Why It is Needed & How To Make it Happen”,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2002, pp. 1 – 8.

③ Ylmaz Akyüz,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and Trade and Growth Prospects in East Asia”, *ADB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2011, No. 242.

④ William E. James, Donghyun Park, Shikha Jha, Juthathip Jongwanich, “The US Financial Crisis, Global Financial Turmoil, and Developing Asia: Is the Era of High Growth at an End?”, *ADB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2008, No. 139.

⑤ 该报告指出，发展中亚洲的新增长战略应包括以下政策：加强内需的政策（即将公司储蓄向家庭储蓄转移、加强社会安全网络建设、改善投资环境、进行短期的财政刺激）、调整生产结构政策（即促进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发展、使产出结构与需求结构相匹配、促进竞争等）、实现供需平衡（即发展金融市场、实行更灵活的汇率政策），以及加强地区和全球合作，等等。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09: Rebalancing Asia's Growth, 2009.

Jimenez 等^①认为, 亚洲国家制成品仍以出口工业国为目的, 后危机时代工业国进口需求下降有可能导致亚洲向工业国出口制成品的增长下降, 但转向以国内消费为中心或以发展中国家为市场的前景可能有限, 南南贸易可能不是南北贸易的替代。

也有学者认为, 亚洲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与内需拉动增长模式并不互相矛盾, 不一定要在依赖内需时放弃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Felipe 和 Lim^②对 1993—2003 年中国、印度、韩国、泰国和菲律宾进行实证分析后认为, 无证据显示上述 5 个国家在从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向内需导向型增长模式发生转变, 同时认为出口与内需拉动增长不相互冲突, 中国等新兴市场为其他采取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市场机会。2011 年亚洲开发银行展望报告认为^③, 加强南南联系是亚洲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道路。

一些学者在研究中也认为, 基于内外部因素的变化, 采用内外需共同拉动经济增长模式的趋势, 早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就已存在。赵春明^④在对东亚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总结后, 认为,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是客观存在的, 本质含义是东亚国家和地区为实现经济现代化而采取并形成的一整套发展措施及体制结构。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并不意味着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终结, 东亚发展模式的走向将从片面追求出口增长的外向型导向战略, 转向以出口导向和内需拉动并重的战略。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上述趋势得到进一步认证。Roach 认为^⑤, 中国经济将会有一次重大的转型发生, 将从出口主导型的增长转向消费拉动型的增长。

① Gonzalo Hernandez Jimenez, Arslan Razmi, “Can Asia sustain an export-led growth strategy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global crisis? Exploring a neglected aspect?”,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13, Vol. 29, pp. 45 - 61.

② Felipe, J., “Is Export-led Growth Passé?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ing Asi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ERD Working Paper*, 2003, No. 48.

③ Asian Development Bank, “Preparing for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11, 2011.

④ 参见赵春明《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历史命运与发展前景》,《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 年第 12 期, 第 61—66 页。

⑤ 参见 Stephen Roach《中国需要一个更加平衡的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导刊》2008 年第 1 期, 第 18—19 页。

当然，也有学者直接质疑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存在。Moon^① 针对世界银行敦促穷国推动出口增长战略提出了质疑，已有的经验表明，外向型国家明显比内向型国家贸易规模更大，也没有更高的贸易扩张速度，出口扩张似乎不是外向型经济的绩效的主要表现。Yang^② 认为，在 71 个所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国家中，仅有 31 个符合出口推动增长的模式，其余则为增长推动出口，因此，事实表明非贸易部门与出口部门共同带来了经济高增长。

二 对亚洲工业化路径变动的检验

经济发展中的需求变动包括两个含义：一是需求总量变动，指不同时期需求规模的扩张或收缩过程；二是需求结构变动，指需求各构成部分在不同时期的比例关系及变化。Chenery（1960 年，1989 年，1995 年）和 Syrquin（1989 年，1995 年）研究了多个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后认为，在工业化进程中，投资率不断提高，消费率不断下降，在工业化结束或经济进入发达阶段之后，投资率和消费率趋于稳定；结构转变是经济发展的中心特征和解释经济增长速度与模式的本质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研究必须充分重视需求结构和生产结构的变动，这是传统增长因素分析所忽略的研究方面。Walker 和 Vatter（1999 年）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历史的研究分析，认为需求的影响在标准生产函数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忽略需求因素的正统经济增长理论无法解释美国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生产力的大幅下降。Buera 和 Kaboski（2008 年）认为，在对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未来的一个方向应该是将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相结合去理解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过程。

按照宏观经济学会计恒等式： $GDP \equiv Y = C_p + C_g + I + X - M$ (1)

其中，GDP 表示国内生产总值， C_p 表示私人消费， C_g 表示政府消费，I 表示本国总投资，X 与 M 分别表示商品与服务的出口与进口，从而 $X - M$ 表示商品与服务的净出口。

根据 Felipe 和 Lim（2005 年）的方法，如果一国满足如下条件，则定义其工业化路径为出口导向型：

① Bruce E. Moon, "Exports, Outward - Oriented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51, No. 1, 1998.

② Jie Yang, "An Analysis of So - Called Export - led Growth", *IMF Working Paper*, 2008.

①出口增长率较高，同时 GDP 与收入的增长率也较高。

②净出口增长率是不断提高的，即出口增长率要高于进口增长率。

根据恒等式 (1)，本国需求由私人消费、政府消费与投资三部分构成，净出口 ($X - M$) 也是总需求的构成部分。按照本国需求与净出口的增长状况，可以将工业化路径区分为如下几种情况。

第一，本国需求增长而净出口增长恶化（净出口为很小的正值或很大的负值）。如果 GDP 的增长为正，则该国增长是内需导向型，这种情形下称该国经济增长为严格的内需导向型工业化路径。

第二，内需与净出口均增长。内需与净出口均促进了经济增长，如果内需增长比净出口增长快，则称该国经济增长为弱内需导向型工业化路径。

第三，内需增长恶化而净出口增长。如果 GDP 增长为正，则该国增长是净出口导向型，如果 GDP 增长为负，则该国的衰退是内需下降造成的。

第四，内需与净出口均恶化。显然该国处于经济衰退期，内需与净出口的下降造成了经济负增长。

本书以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为分界点，将时间跨度划分为 1988—1997 年、1998—2007 年、2008—2010 年三个阶段，对所选的 9 个亚洲国家进行工业化路径的分析。为了计算各支出项目的平均增长率，本书采用变量的几何平均增长率： $g = (x_T/x_0)^{1/T} - 1$ ，其中 g 表示变量 x 的增长率， T 为时间跨度。另外，根据式 (1) 对 GDP 增长率进行分解可得到：

$$GDP = (C_p/GDP) \cdot \dot{C}_p + (C_g/GDP) \cdot \dot{C}_g + (I/GDP) \cdot \dot{I} + (X/GDP) \cdot \dot{X} - (M/GDP) \cdot \dot{M}$$

其中， GDP 表示变量 GDP 的增长率，其他变量含义依此类推，因此，GDP 增长率可以表示为各支出项目占 GDP 的份额与其增长率相乘之后再求和，即 GDP 增长率是各支出项目增长率按其 GDP 份额加权平均后得到的增长率。

表 12—1 至表 12—4 分别给出了按 2000 年价格（美元）计算的亚洲九国（日本、中国、韩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的各支出项目占 GDP 的份额，亚洲九国各支出项目平均增长率（2000 年价格），亚洲各支出项目按其 GDP 份额加权的平均增长率（2000 年价格），亚洲九国支出项目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2000 年价格）。

比较三个时间段可知，亚洲九国净出口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1988—1997年间，亚洲九国的净出口状况是恶化的。虽然出口年平均增长率在9%以上，但低于进口的年平均增长率，按GDP份额加权的净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负。

但在1998—2007年与2008—2010年两个时间段内，亚洲九国净出口状况有明显改变。亚洲九国出口占GDP的份额从1988—1997年间的14%上升到1998—2007年间的26%，到2008—2010年间更是上升到35%。进口占GDP的份额从1988—1997年间的14%先上升到1998—2007年间的22%，进而上升到2008—2010年间的27%。在1998—2007年间，亚洲九国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6%，高于进口年平均增长率8.01%，按GDP份额加权的净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在2008—2010年间，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亚洲九国出口年平均增长率大幅下降到3.81%，进口年平均增长率也下降到3.94%，出口年平均增长率略低于进口年平均增长率，但按GDP份额加权的净出口年平均增长率仍然为正（0.26%）。

再就亚洲九国内需与净出口比较变化来看，亚洲九国在1998—2007年间奉行的是出口导向增长战略。在1998—2007年间，亚洲九国的私人消费、政府消费与总投资的增长率分别为2.1%、3.93%、2.54%，均远远低于10.60%的出口增长率。按GDP份额加权的平均内部需求增长率为2.43%，也低于按GDP份额加权平均的出口增长率（2.75%）。私人消费、政府消费与总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3.59%、18.30%、20.61%，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27.5%。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亚洲九国在2008—2010年间经济增长战略出现了变化，由奉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战略逐渐调整为弱内需导向型经济增长战略。在2008—2010年间，亚洲九国的私人消费、政府消费与总投资的增长率分别为2.01%、3.72%、3.23%，但出口增长率已下降到3.81%。按GDP份额加权平均的内部需求增长率为2.48%，高于按GDP份额加权平均的出口增长率（1.33%）。私人消费、政府消费与总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6.06%、21.49%、34.36%，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也下降到8.09%。与1998—2007年这一时间段相比，2008—2010年间亚洲九国的总投资的增长率有大幅提高，总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也大幅增加，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下降较大。

表 12—1 支出项目占 GDP 的份额 (2000 年价格) 单位: %

	时 间	(1) 私人消费	(2) 政府消费	(3) 总投资	(4) 内需	(5) 出口	(6) 进口	(7) 净出口
亚洲 九国	1988—1997	0.55	0.14	0.31	1.00	0.14	0.14	0.00
	1998—2007	0.53	0.16	0.28	0.97	0.26	0.22	0.04
	2008—2010	0.48	0.16	0.29	0.93	0.35	0.27	0.08

注: (4) = (1) + (2) + (3); (7) = (5) - (6)。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 12—2 各支出项目平均增长率 (2000 年价格) 单位: %

	时 间	GDP	私人消费	政府消费	总投资	出口	进口
亚洲 九国	1988—1997	4.28	4.12	4.06	5.31	9.19	10.81
	1998—2007	3.43	2.10	3.93	2.54	10.60	8.01
	2008—2010	2.74	2.01	3.72	3.23	3.81	3.94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 12—3 支出项目按其 GDP 份额加权的平均增长率 (2000 年价格) 单位: %

	时 间	(1) GDP	(2) 私人消费	(3) 政府消费	(4) 总投资	(5) 内部需求	(6) 出口	(7) 进口	(8) 净出口
亚洲 九国	1988—1997	4.28	2.26	0.58	1.63	4.47	1.30	1.49	-0.19
	1998—2007	3.43	1.11	0.62	0.70	2.43	2.75	1.75	1.00
	2008—2010	2.74	0.97	0.58	0.93	2.48	1.33	1.07	0.26

注: (1) = (5) + (8); (5) = (2) + (3) + (4); (8) = (6) - (7)。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 12—4 支出项目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 (2000 年价格) 单位: %

	时 间	(1) 私人消费	(2) 政府消费	(3) 总投资	(4) 内部需求	(5) 出口	(6) 进口	(7) 净出口
亚洲 九国	1988—1997	52.37	13.48	36.86	104.71	28.51	31.22	-2.70
	1998—2007	33.59	18.30	20.61	72.50	79.56	52.05	27.51
	2008—2010	36.06	21.49	34.36	91.91	47.74	39.65	8.09

注: (4) = (1) + (2) + (3); (7) = (5) - (6)。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数据库。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作出的基本判断是，亚洲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路径仍具有可持续性，净出口在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亚洲国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工业化路径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即从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路径逐渐调整为弱内需导向型工业化路径。

三 亚洲工业化路径转轨的前提

由于亚洲经济发展的客观条件与欧美不完全相同，亚洲工业化进程的转型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前提。

第一，经济发展阶段。当前，除日本、“亚洲四小龙”处于后工业化阶段或进入服务社会外，相当一部分亚洲经济体尚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之中。要完成工业化任务，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亚洲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即在继续保持亚洲生产规模扩张的前提下逐步摆脱对外部需求的依赖，也就是说，生产规模的扩张是第一位的，需求结构的调整是第二位的，亚洲工业化路径的调整不能以缩减生产规模为代价。

第二，国际分工。亚洲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既是亚洲工业化进程的内在逻辑结果，也是亚洲参与国际分工的必然选择。亚洲自主工业化路径的实现不是从现有的国际分工格局中退出，相反，如果要解决亚洲众多人口的就业和收入增长问题，亚洲仍需要在未来一定时期内继续保持其世界制造中心的地位，特别是与美国之间形成的亚洲生产—美国消费的模式不可能在短期内有所转变，因而亚洲经常项目盈余只能是一个逐渐缩减的过程，这也意味着对亚洲经济体而言，外部市场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将会长期存在，不排斥部分亚洲经济体继续采用出口导向模式。

第三，政府推行自主增长政策的可能性。启动内需、自主增长与过去推行出口导向型模式有很大不同。过去亚洲政府可以利用自身强有力的国内资源动员能力，推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而要培育内需市场却很难通过“动员”方式来实现，这是因为启动内需既以一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为基础，同时也以财政和金融等经济制度的完善为前提，而政府刺激内需的政策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短期内有效，^① 长期内却不可持续。^②

① Seok - Kyun Hur, Shikha Jha, Donghyun Park, and Pilipinas Quising, "Did Fiscal Stimulus Lift Developing Asia out of the Global Crisis? A Preliminary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DB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15, August, 2010.

② Charles Adams, Benno Ferrarini, and Donghyun Park, "Fiscal Sustainability in Developing Asia", *ADB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05, June, 2010.

综上所述，亚洲实现自主增长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工业化路径转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特别是在亚洲经济发展还没有进入发达阶段之时，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只能居于从属地位，一旦外需市场有所扩大，亚洲工业化路径也有可能回归传统模式。

四 亚洲工业化路径转轨的外部因素

就外部条件来看，一方面，发达国家市场扩张的有限性已经显现，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深受债务危机和信用危机的困扰，很难对世界经济增长构成强有力的支持。自20世纪60年代之后，发达国家不断向亚洲进行产业转移，其结果是发达国家在逐渐摆脱生产者身份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其在世界中的消费者地位，国内需要的大量产品必然要通过进口方式来满足，这样其对世界产品也就形成了长期的“存量”需求市场。如图12—1所示，美国制造业占其GDP比重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短暂提升之后，一直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美国进口占GDP的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产品贸易由20世纪60年代初的略有盈余转为70年代的逆差，且逆差不断扩大，到2006年达到峰值，为8357亿美元，虽然金融危机后有所下调，但2011年贸易逆差仍达到7383亿美元。在美国扩大进口的过程中，美国从亚洲进口的产品在其进口总额中的占比保持上升态势，这一态势一直持续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前后，此后这一比重维持在35%左右的水平上。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特征又为后起国家采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路径提供了长期、稳定的支持。美国从亚洲进口的最终产品占其从亚洲进口的全部产品的比重一直保持上升态势，2000年为51.2%，2005年上升到56.9%，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这一态势也没有因危机导致的消费需求萎缩而有所下降，2010年继续上升到58.8%。由此可见，发达国家长期形成的“固有”的消费需求，特别是对亚洲国家所提供的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为亚洲产品出口提供了长期稳定的市场，这为亚洲国家长期采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路径提供了决定性前提，也导致亚洲国家缺乏内在的调整动力。

简而言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进口市场的“性质”有可能发生改变。过去发达国家消费市场之所以对后起国家具有重要的拉动作用，是因为发达国家市场规模大，同时还是一个扩张的市场。而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消费扩张有可能出现停滞或不稳定变化趋势，这为后起国家能否利用发达国家的消费市场实现经济增长带来了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市场，其作为一个“存量”市场仍然存在，但是能否拉动后起国家经济增长所必须具有的“增量”需求扩张，则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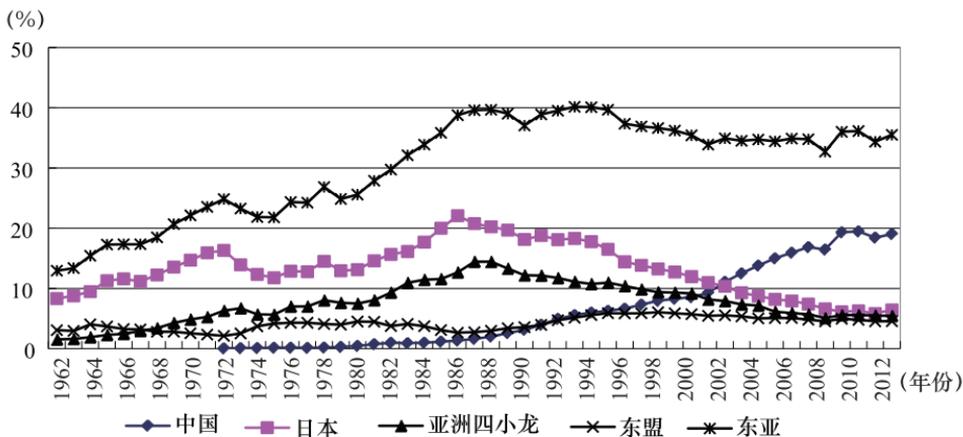


图 12—1 1962—2012 年美国从东亚进口占其全部进口的比重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数据库。

五 亚洲工业化路径转型的内部动力

依靠内需还是外需来启动工业化进程或拉动经济增长，实质上是一国经济发展战略作用于客观现实的反映。对于非大国而言，在国内市场难以满足生产规模需要时，开放更显得尤为重要。钱纳里等人关于工业化的研究成果表明^①，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的国家经济结构转变速度较快，要比实行进口替代的国家有更快的发展。即使后起大国实行开放战略也可以补充国内市场规模不足，特别是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可以起到加速工业化进程的作用，如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后经济实力获得较快提升即是如此。对于经济规模不大的国家而言，由于一国国内市场规模狭小，不足以支撑工业化所需要的生产规模，在封闭的条件下，一国也难以有较高的经济增

^① 参见 [美] 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吴奇等译，上海三联书店 1989 年版。

长速度，因此后来推行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最后大多转变为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

实践也证明，较早实行开放的经济体由于提前成功地利用了外部市场提供的机会，因而经济增长速度比不开放的国家更快，这一点从东亚已经发展起来的“亚洲四小龙”以及部分东盟成员那里得到了印证。在 20 世纪 50 年代，拉美和东亚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基本上是进口替代政策的实践者，到了 60 年代，东亚和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则开始分道扬镳，拉美继续推行进口替代政策，而东亚，主要是“亚洲四小龙”开始推行出口导向战略，积极利用外部市场，加快工业化进程。东亚国家或地区经济的成功证明了出口导向型开放战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没有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的国家仍然处在落后的农业国阶段。此后，东亚其他经济体也开始转而推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且沿用至今。^① 由表 12—5 可见，部分国家花费了较长的时间完成人均 GDP 2000 美元的目标，如菲律宾花费 24 年时间达到人均 GDP 2000 美元的目标，其中在从 1000 美元向 2000 美元过渡时，有一部分是货币升值作用的结果，而韩国、中国等则在较短时间内达到这一目标。

近年来，特别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国家工业化进程或经济增长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依靠内需拉动增长的条件日趋成熟。为更好地突出亚洲自我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这里主要考察亚洲国家经济规模和人口变化情况。我们认为，当一国经济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该国往往具有自我拉动经济增长的内生能力。这一点在亚洲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表现较为突出。由表 12—6 和表 12—7 可见，亚洲人口和经济大国主要是日本、中国和印度，以及后来加入的印度尼西亚，其他国家除越南是从小国跃上中等国家之外，都属于中等国家。大国本身具有拉动经济增长的内需能力，中等国家需要达到一定的经济规模之后才会具有拉动经济增长的内需条件。经过多年的发展，亚洲国家主要依靠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来实现经济总量的扩张（如图 12—2 所示）。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亚洲国家占世界人口比重基本上呈下降或不变趋势，少数国家呈上升趋势，如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经济规模的扩张主要靠人均收入水平的提

^① Jesus Felipe and Joseph Lim, “Export or Domestic - Led Growth in Asi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ERD Working Paper*, No. 69, 2005.

升，多数国家人均 GNI 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少数人口增长较快的国家人均收入水平提升较慢，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即便如此，亚洲部分国家在经济规模上也发生了跳跃，如印度尼西亚从中等国家跃升为大国，越南从小国转变成为中等国家，其他国家尽管没有发生上述变化，但也在经济总量上实现了扩张，甚至是数十倍的变化。正是这种总量扩张导致亚洲国家能够纷纷调整经济发展战略，除继续依靠出口外，也转而倚重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如韩国转变观念，加大吸引外资力度，以刺激经济内生活力，越南在过度“开放”之后，也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政策问题，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以发挥内部活力；菲律宾也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以加快国内供给能力的提升。

表 12—5 东亚各国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表现

国家和地区	2013 年人均收入/美元	达到不同收入点所花的时间/年			年增长率/%			币值变化/%		
		达到 1000 美元	达到 2000 美元	达到 5000 美元	达到 1000 美元	1000—2000 美元	2000—5000 美元	达到 1000 美元	1000—2000 美元	2000—5000 美元
韩国	23838	14 (1977)	7 (1983)	6 (1989)	8.8	6.4	9.0	9.8	8.2	-2.4
中国台湾	20706	16 (1976)	4 (1980)	7 (1987)			7.7			
中国大陆	6569	23 (2001)	5 (2006)	5 (2011)	9.7	10.6	10.5	7.2	-0.7	-4.1
马来西亚	10429	7 (1977)	11 (1988)	17 (2005)	7.8	5.9	6.6	-3.1	0.6	2.2
泰国	5879	8 (1988)	15 (2003)	8 (2011)	6.9	5.5	3.6	2.7	3.4	-3.8
印度尼西亚	3499	13 (1995)	13 (2008)		7.2	3.4		9.9	11.9	
菲律宾	2792	16 (2002)	8 (2010)		3.5	5.1		6.0	-1.7	
越南	1896	22 (2008)	6(2014)*		7.2	5.7		34.8	5.2	

注：括号内的数据为年份。韩国、中国台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中国大陆和越南的计算起点分别是 1963 年、1960 年、1980 年、1970 年、1982 年、1986 年、1978 年和 1986 年，以各经济体实行较大的经济发展战略调整为开端。带 * 的数据是根据越南的预测数计算的。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 12—6 亚洲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变化、人均 GNI
收入变化和经济规模占世界 GDP 比重

单位：美元（2005 年不变价格）；%

		1960 年	1970 年	1980 年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	2012 年
人口	中国	22.1	22.3	22.2	21.6	20.8	19.5	19.2
	日本	3.1	2.8	2.6	2.3	2.1	1.9	1.8
	印度	14.9	15.1	15.8	16.5	17.1	17.6	17.6
	韩国	0.8	0.9	0.9	0.8	0.8	0.7	0.7
	印度尼西亚	2.9	3.1	3.3	3.4	3.4	3.5	3.5
	泰国	0.9	1.0	1.1	1.1	1.0	1.0	1.0
	马来西亚	0.3	0.3	0.3	0.3	0.4	0.4	0.4
	菲律宾	0.9	1.0	1.1	1.2	1.3	1.4	1.4
	越南	1.2	1.2	1.2	1.3	1.3	1.3	1.3
人均 GNI	中国			220	464	1108	2857	
	日本	7045	15140	20972	31395	34464	37433	
	印度	227	272	292	398	571	1023	1096
	韩国	1486	2567	4200	8762	14352	20650	21675
	印度尼西亚	287	333	534	801	1012	1526	1682
	泰国	356	581	869	1543	2161	3023	3220
	马来西亚	784	1350	2236	3024	4487	6087	6513
	菲律宾	686	809	1094	986	1060	1407	1496
	越南				252	468	816	986
GDP	中国	5.6	3.4	1.8	1.6	3.7	9.5	12.0
	日本	4.0	7.8	10.4	14.2	14.8	8.7	8.6
	印度		2.4	1.8	1.5	1.5	2.7	2.6
	韩国	0.4	0.3	0.6	1.2	1.7	1.6	1.6
	印度尼西亚	0.4	0.7	0.5	0.5	1.1	1.3	
	泰国	0.3	0.3	0.3	0.4	0.4	0.5	0.5
	马来西亚	0.2	0.2	0.2	0.2	0.3	0.4	0.4
	菲律宾	0.6	0.2	0.3	0.2	0.3	0.3	0.4
	越南				0.0	0.1	0.2	0.2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 12—7 亚洲国家经济规模、人均收入 (GNI) 水平的变动

		1960 年	1970 年	1980 年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	2012 年
大国	10726 以上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3466—10725	日本						
	876—3465					中国	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	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
	小于 875	中国、印度	中国、印度	中国、印度	中国、印度	印度		
中等国家	10726 以上					韩国	韩国	韩国
	3466—10725			韩国	韩国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876—3465	韩国	韩国、马来西亚	菲律宾、马来西亚	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	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	菲律宾、越南、泰国	菲律宾、越南、泰国
	小于 875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	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	印度尼西亚、泰国	印度尼西亚	越南		
小国	10726 以上							
	3466—10725							
	876—3465							
	小于 875	越南	越南	越南	越南			

注：(1) 本报告涉及的国家，即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印度。(2) 人均收入标准按世界银行设定的标准。(3) 经济规模中，大国标准按当年该国占世界 GDP 比重大于 1%，人口大于世界人口总和的 1%，中等国家标准为按当年该国占世界 GDP 比重为 0.1%—1% 区间，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为 0.1%—1%，小国标准为 0.1% 以下。经济规模为第一参考标准，再辅之以人口。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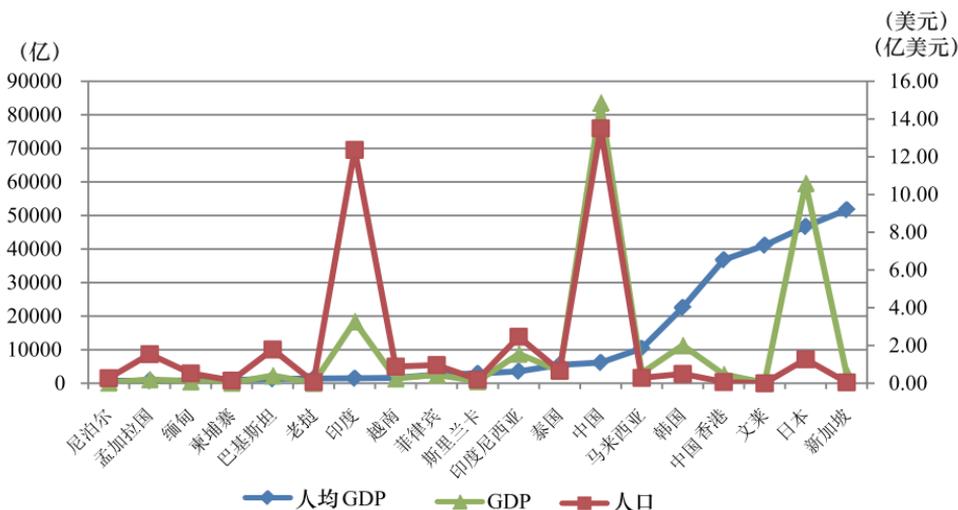


图 12—2 2012 年亚洲人口（右轴）、人均 GDP（左轴）和 GDP（左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第二节 对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在亚洲实践的拓展性总结

自诞生以来，工业文明就以其先进的气息和活力向全球蔓延开来，这一过程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但是也有其偶然性。必然性是指工业文明以超过人类社会之前存在的一切文明的生产方式和效率，涤荡全球每一个角落，也因此，工业文明自出现以来从未停止过前进的步伐，也从未忘记过与世界存在的一切文明开展竞争。实际上，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工业文明已经开始其“旅行”的路程，从英国逐渐向欧美的其他国家扩散，到 19 世纪末，不仅在西方国家落地生根，甚至远及亚洲的日本。这也是亚洲工业化发展的历史必然。

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出现工业文明都有其偶然性，是国内外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人们探寻为什么某一国家能够出现工业文明，而不是在另一个国家或地区时，如果不能综合进行考察，则很难得出“答案”。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亚洲开始启动了工业化进程，直到今天这一进程仍在继续着，有的国家借助得天独厚的外部条件和内部优势，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任务，有的则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正在从工业化的某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而有的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不管怎样，亚

洲丰富多彩的工业化实践为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不仅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的正确性，而且有助于完善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体系。

一 亚洲工业化路径与世界工业化一般路径的比较

世界各国或地区因其内在的特殊条件而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工业化道路。徐彰等^①以英国、美国、日本工业化早期阶段为研究对象，总结了三种工业化发展模式，即内生型的英国模式、市场为主政府为辅的美国模式、市场与政府高度结合的赶超型日本模式。

（一）世界工业化的一般进程

从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历史来看，英国是产生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最早的国家，之后开始向欧美国家扩散，主要表现是工业部门占 GDP 的比重上升，并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出现了工业化史上的重大转折，即工业化进程出现了峰值期并相随出现了结束阶段，部分工业化国家自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开始相继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步下降。

作为最早推行工业化的国家，英国大约在 17 世纪后半期，工业在 GDP 中的比重就已超过 20%（1688 年为 21%），但工业化的起始阶段大致在 18 世纪中期以后（1770 年），当时工业占 GDP 的比重约为 24%。这样，工业占 GDP 20% 左右的状况持续了 100 多年，而从 1770 年以后到 1841 年用了 70 年超过 30%，又用了 60 年在 1901 年超过 40%。到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又用了近 60 年时间使其接近 50%。在上述漫长的工业增长时期，尽管英国“世界工厂”的地位逐步丧失，英国的工业却一直在经济中占重要地位，并且其比例是在不断上升的。在此期间，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先后发展自己的工业，也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工业化，而且在它们的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在 GDP 中的地位也是不断上升的，没有明显的下降过程。

美国工业发展较晚，19 世纪中叶，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才超过 20%。进入 20 世纪后，两次世界大战使欧洲饱受战争磨难，美国工业却获益匪

^① 参见徐彰、张超《产业革命、主导产业的形成与政策选择——基于英国、美国、日本工业化早期阶段的经验研究》，《财政研究》2006 年第 6 期，第 37—39 页。

浅，在经济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到20世纪50年代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已超过40%。美国工业发展至此，一直保持着经济地位的上升趋势，这是与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相同的。

日本是亚洲最早开始工业化的国家。20世纪初，日本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超过20%，到1940年已接近一半。

从英国、美国、日本这三个具有代表性国家的工业发展历史看，工业化的起始阶段相差数十年以至上百年的，工业化的初期是不同步的。在工业的上升阶段，工业发展比较早的是英国，其他欧洲国家大致在19世纪初期到中期开始，美国稍晚些，日本则更晚至19世纪后期才开始。但是，它们大致都在20世纪中期达到各自工业化的顶峰。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上述工业化发展进程出现重大转变。20世纪5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化国家开始进入工业化后期，即工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开始相对下降，这是自英国工业革命以后三百年所没有的现象。

从世界范围看，这一转变的突出特点是出现了明显的同步性。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起飞期和上升期并不相同，以英日为例，两者相差两百多年，但这些工业化国家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工业相对下降期。由于这些主要工业化国家的经济规模巨大，它们的经济发生同步性的方向转变，就导致世界经济的整体环境因之有所转变。这对后发国家来说，就意味着外部环境的重要转折，后发国家必须选择或调整发展方向及路径，以适应这种外部环境变化，从而促进自己的经济快速发展（如图12—3和表12—8所示）。

从上述情况看，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工业化的发展出现三个特点：一是实现工业化的过程有可能大大缩短；二是工业化的高峰期可能很短；三是工业相对下降的发生十分集中，或可称为出现了同步性的工业相对下降。

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工业比重同步下降，使世界在这些国家的引领下见证了工业化的峰值并由此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为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展示了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中的一段基本进程：工业部门的发展有其上限，也有其延续的阶段性期限；在达到其高峰上限后，即有可能逐步转入相对下降过程，相应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发展阶段。后起国工业化可能得到后发优势，但是从工业发展的初期阶段进入其峰值时期或转折时期的过程越来越短，并且这一转折时期的相对集中出现，使后起国工业在经济起飞后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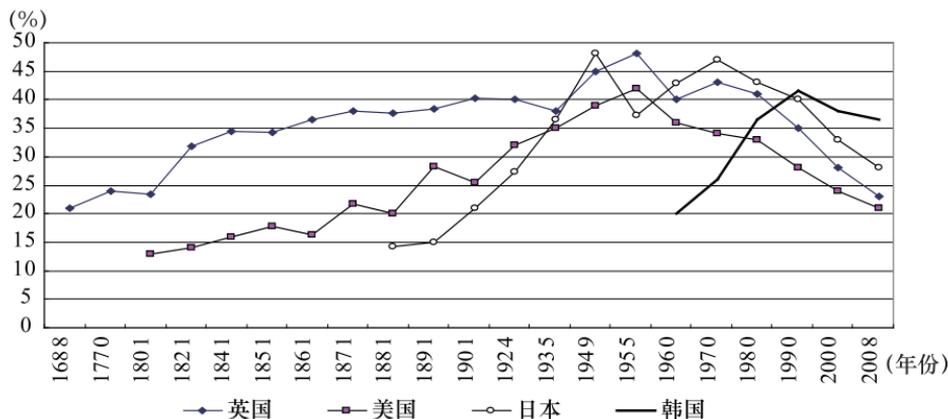


图 12—3 1688—2008 年世界部分工业化国家工业在经济中的相对地位变化过程

注：为图示简洁，1955 年以前根据前引黄少军《服务业与经济增长》数据调整，时间间隔不均匀；美国和日本数据的年度为近似值。1955 年及之后数据引自世界银行、OECD 等国际机构的数据库。

表 12—8

英美日工业在经济中比重的上升历程

单位：%

英 国		美 国		日 本	
年 代	工业比重	年 代	工业比重	年 代	工业比重
1688	21				
1770	24				
1801	23.4	1799	13		
1821	31.9	1819	14		
1841	34.4	1839	16		
1851	34.3	1849	17.8		
1861	36.5	1859	16.2		
1871	38.1	1869	21.8		
1881	37.6	1879	20.1	1885	14.3
1891	38.4	1889	28.3	1890	14.9
1901	40.2	1900	25.4	1900	21
1924	40	1920	32	1925	27.3
1935	38	1940	35	1935	36.5
1949	44.9	1950	39	1940	48.2
1955	48.1	1955	42	1955	37.3

资料来源：引自黄少军《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年出版。

（二）亚洲工业化进程

亚洲地区多数经济体的工业化进程短而急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半个多世纪，部分经济体已完成了工业的上升，以及向工业化后期以至后工业化社会过渡的迅速转折过程。以韩国为例，它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其工业化进程，用了约 30 年时间使工业占 GDP 的比重达到高峰，而后即出现向下的转折，其速度和进程都比较典型。

亚洲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是建立在发达国家向外转移产业的基础上的。世界发达国家依赖其工业部门的逐步发展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或短期的起飞，这一工业化进程所需时间差别很大。与欧美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相比，亚洲工业部门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上升较快，但在其高峰处停留时间较短即转向后工业化阶段。

亚洲各经济体的经济规模和发展阶段差距很大，因而它们参差不齐的发展程度综合在一起就模糊了地区整体结构的发展进程，使之发展方向不如发达工业化国家那样明确和持续，甚至还会出现反复。但总体来看，亚洲各经济体之间的工业结构保持较流畅的接续性，使整个地区的工业及制造业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就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成为世界重要的制造中心之一，也为整个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提供了比较稳定和坚实的产业基础。

1. 亚洲地区整体产业结构保持较高的制造业比重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日本经济在持续高增长的支持下，规模迅速扩张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后在 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亚洲四小龙”也相继完成了工业化的上升阶段，并先后进入向工业化后期转变的阶段。由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规模在完成工业化进程期间在亚洲地区经济总规模中所占的比重很高，因此它们的经济结构发展走势就决定了地区经济结构的走势，使地区整体的工业部门在经济上所占的比重在 20 世纪 70—90 年代呈相对下降态势，从 1973 年 43% 的历史最高点逐步下降到 2002 年的 34%，这甚至要低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的水平。不过，尽管这 30 年间亚洲工业比重在相对下降，但仍比同期 OECD 国家的工业比重高很多，后者是从 38% 下降到 26%。也就是说，亚洲在 2002 年工业比重处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最低点时，仍要比 OECD 的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出 8 个百分点。这也是亚洲成为世界制造中心之一的基础（如图 12—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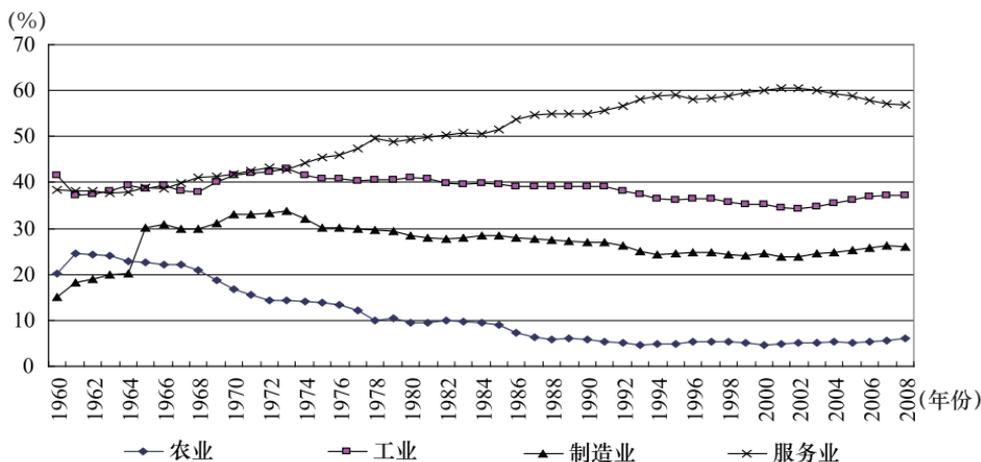


图 12—4 1960—2008 年亚洲整体以美元计值的主要产业结构的变化

注：1965 年以前制造业未含中国、印度尼西亚。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数据库数据整理。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使其在亚洲地区的比重持续上升，特别是在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不仅保持着经济的较高增长率，而且在周边主要经济体的货币纷纷贬值时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其结果是中国在亚洲区域经济各主要产业中的比重迅速上升。2000 年以后，东盟国家的经济也开始相继恢复增长，它们的工业比重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中国和东盟的工业化上升进程扭转了亚洲整体工业部门比重下降的趋势，将其转为停顿甚至微升。到 2008 年，亚洲工业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回升到 37%，而此时 OECD 国家平均中的比重在 25% 左右，这意味着亚洲仍保持着世界制造中心的地位。

2. 经济规模是影响亚洲经济结构中个体地位的重要因素

如上所述，亚洲整体产业结构的变化受中国和日本等区内主要经济体结构变化的影响很大，而影响亚洲各经济体在地区产业结构中的地位的主要内在因素有两个：一是经济体的经济规模；二是经济体所处的发展阶段。不过，由于这里以时值美元为计算单位，影响 GDP 的实际因素就不仅有实际经济增长水平，也有当时各经济体对美元的汇率。这样，汇率就成为影响对这些经济体相互间关系进行比较判断的外在因素，甚至在特定时期成为决定性因素。受此影响，部分时期亚洲各经济体之间经济地位的对比结构是扭曲的。

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比较经济体之间经济规模的重要指标，而 GDP 是由各产业构成的，因此在亚洲这个具有经济体间巨大规模差异的地区，GDP 的规模基本上直接决定了地区各产业结构中各经济体所占的份额。或者说是经济体的经济规模决定了它在地区产业结构中的基本位置。中国和日本是亚洲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因而在各主要产业中，中日共同或独自占据了主导地位。从 50 多年来亚洲的整体经济情况看，中国和日本的经济规模在地区经济中所占份额最大，但这一比例呈逐步下降趋势，大致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的 85% 下降到 2007 年 74% 的最低点。中、日在亚洲地区的经济地位有所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亚洲四小龙”所占份额持续上升，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的 5% 上升至 2007 年的 17%。与之相比，东盟四国的份额从长期发展进程看，大致在略低于 9% 的范围内波动，没有明显的持续上升（如图 12—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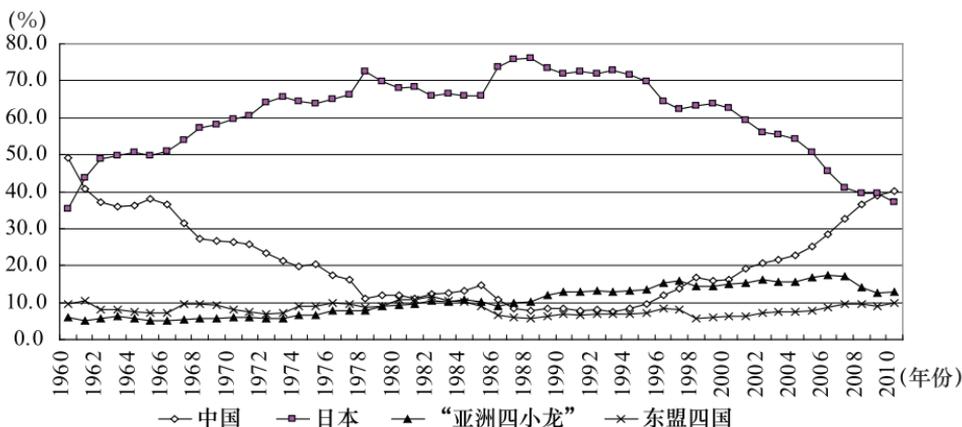


图 12—5 1960—2010 年亚洲经济体占地区 GDP 份额的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数据库数据整理。

3. 发展水平是影响亚洲产业结构的地理分布的重要因素

50 多年间，亚洲经济总量中最大的地理分布结构变化就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地位互换，这一转换过程主要发生在亚洲的工业领域，亚洲农业基本是中国地位一直超过日本；亚洲服务业是中日地位逐步接近但尚未发生互换。

首先是亚洲农业部门的地理分布结构变化。日本农业虽然在其经济中

呈下降趋势，但随日元的升值和中国农业的停滞，日本农业部门在亚洲农业中的份额于 1978 年略超过中国；这一现象第二次出现在 1993 年，其主要原因是日元升值和人民币贬值。此后，随着经济增长和汇率升值，中国农业在亚洲农业中的地位急速回升，再没给日本超过中国的机会。农业的情况表明，日本农业在持续下降的过程中，本无超过中国农业地位的机会，但因汇率等其他原因，出现了日本农业超过中国农业的瞬间（如图 12—6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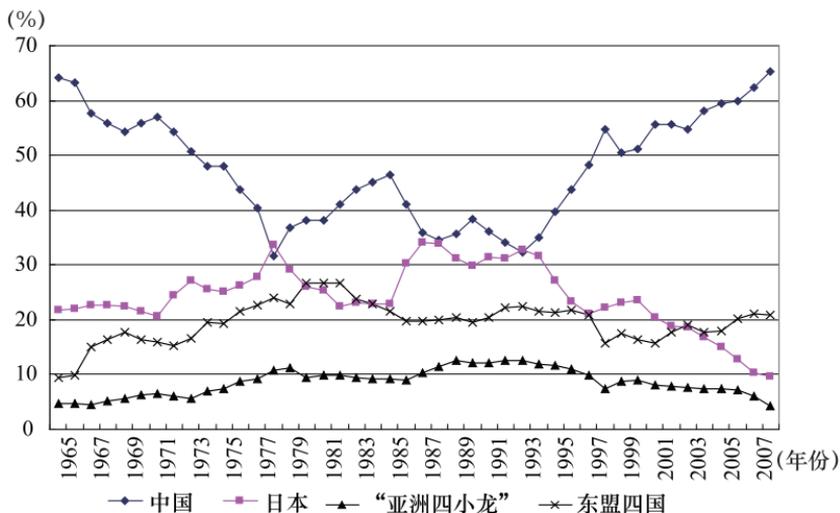


图 12—6 1965—2007 年亚洲农业部门的地域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数据库数据整理。

其次是亚洲工业部门的地理分布结构变化。这是亚洲区域产业结构中，中国超过日本的最主要产业领域。中国工业在亚洲工业中的地位经历了 20 世纪 60 年代到 1978 年，以及之后到 1993 年的两个阶段的下降或沉寂后，在 1993 年至今的发展阶段中迅速上升，2006 年中国工业在亚洲工业中的份额与日本持平，随后即快步超越日本（如图 12—7 所示）。

最后是亚洲服务业部门的地理分布结构变化。这是中国在亚洲三个主要产业中所占份额最低的产业部门，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中国服务业只占亚洲服务业的 5%，这对中国这样巨大的经济体来说是太低了，而日本则在最高时占有 75%—80% 的份额，或者说是亚洲服务业在较长时期内一直是日本一家独大。1993 年以后，中国的服务业在亚洲服务业中的份额

才有了较快的上升，但因与日本的差距过大，只是大幅度地缩小了与日本地位的差距，但仍未能超过日本的份额（如图 12—8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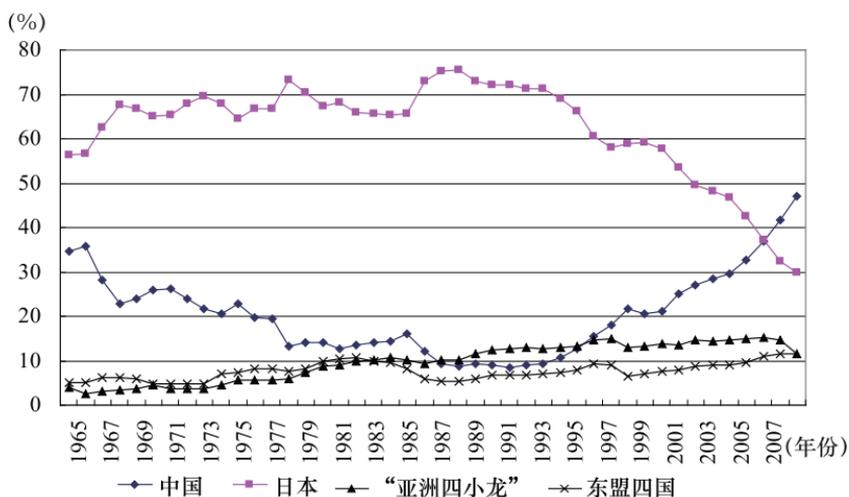


图 12—7 1965—2007 年亚洲工业部门的地域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数据库数据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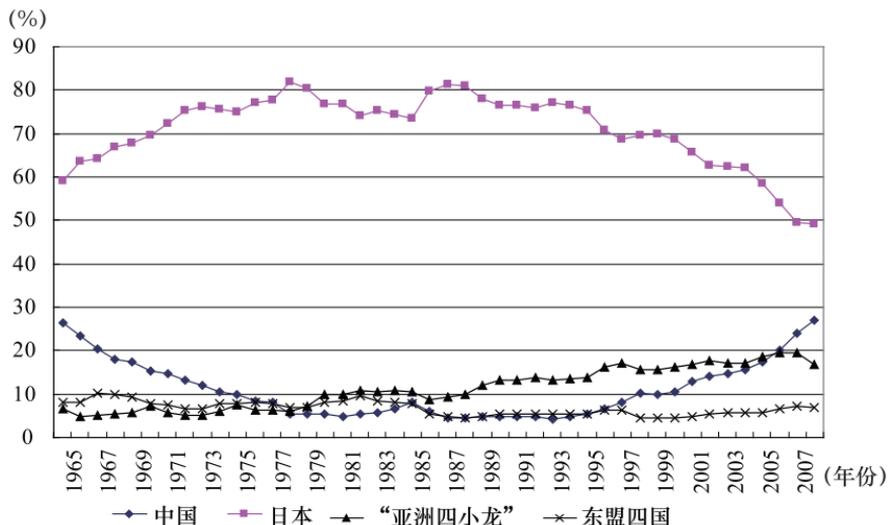


图 12—8 1965—2007 年亚洲服务业部门的地域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数据库数据整理。

(三) 与世界工业化路径的相似性

1. 亚洲各经济体农业在产业结构中的趋同下降

亚洲各经济体的农业部门在经济中的比重逐步下降自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 下降的过程持续至今并未结束。以农业在 GDP 中所占份额分类, 目前亚洲的农业结构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是已完成工业化的经济体, 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其基本特征是农业比重持续下降, 在经济中所占份额很低, 在 3% 以下。二是正在进行工业化的经济体, 包括中国和东盟四国, 其特征是农业的下降过程波动较大, 目前在经济中所占份额大致在 10%—15%。亚太农业部门的相对下降基本反映了这些经济体之间的发展水平差距。

值得注意的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 东盟四国的农业部门相对下降趋势相继出现了可能的停滞倾向。最先出现农业停降的是泰国, 其农业在 1994 年开始停止下降 (不过从长期过程看, 这一转折应与马来西亚相近, 都是在 2000 年前后出现); 而后是马来西亚从 21 世纪开始农业份额出现波动缓升, 2005 年之后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也出现了农业比重停降的倾向 (如图 12—9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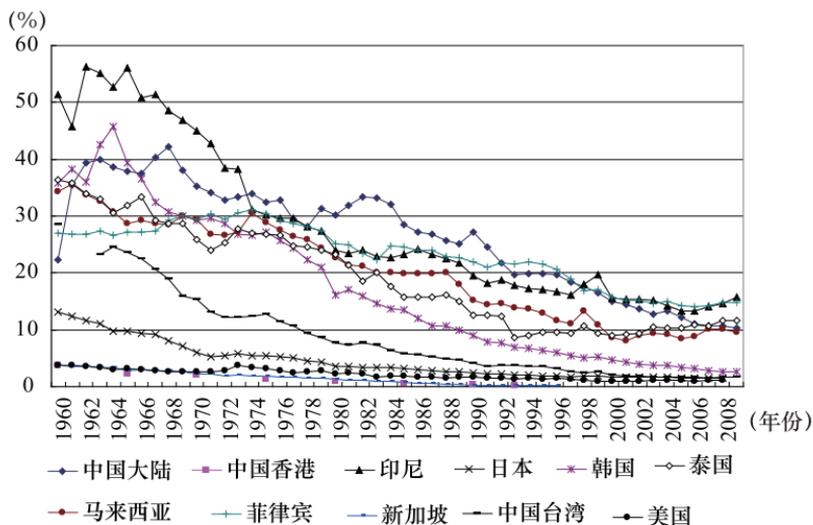


图 12—9 1960—2008 年亚洲各经济体 GDP 中农业份额的逐步下降

资料来源: 根据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数据库数据整理。

2. 亚洲各经济体服务业的相对平稳发展

亚洲服务业的结构变化也有较明显的发展阶段。经过 50 多年的发展,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等后工业化经济体中服务业所占比重基本在 70% 以上,仅韩国因发展进程稍晚于这些经济体而较低,为 60%。它们的服务业所占比重大致是在工业化结束后即开始逐步上升,其间没有很明显的波动。

中国和东盟等正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服务业比重基本在 45% 以下,只有菲律宾较高,达 55%。1978 年以前,中国采用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进行国民经济统计核算;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研究采用国民账户体系(SNA),其后对 1978 年以后的统计数据进行回溯调整,调整幅度最大的就是服务业的统计数据,^①使 1985 年以后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有明显提升。但是对服务业的低估依然存在,以至在 2003 年的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后,对 2004 年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调升了 9 个百分点而使其超过了 40%。东盟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的服务业在近 50 年中的变化趋势大致相似,都是小幅波动并基本回到原点上,其工业化进程的背景是工业持续上升,并未出现明显向后工业化社会转折的时点,因而服务业没有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那样持续上升。只有菲律宾情况较特殊,其服务业比重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缓慢上升,同期制造业比重则出现停滞并转向相对下降(如图 12—10 所示)。

3. 亚太制造业的继起性发展

亚洲各经济体的制造业变化比农业和服务业相对复杂,具有较明显的继起特征。日本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制造业占比相对下降,亚洲多数经济体的工业化正开始进入起步的初期,其中“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的制造业比重增长速度较快,迅速在 20 世纪 80 年代先后达到其峰值,随后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进入相对下降期;中国香港的工业化进程则较早,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发展后,20 世纪 70 年代初其制造业即开始进入相对下降期,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则大幅度迅速收缩。东盟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的制造业则持续保持上升态势,直到 2000 年以后才出现停滞。菲律宾的制造业发展得较早,它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就达到 25% 左右的较高地位,这一水平在小幅波动中一直保持到 20 世纪 80 年代

^① 参见许宪春《世界银行关于中国 GDP 数据的调整及其存在的问题》,《经济研究》1999 年第 6 期,第 110—116 页。

初，而后逐步下降。中国制造业较特殊，1978年以前是相对封闭状态下的发展，由于采用的是物质产品平衡表核算体系（MPS）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非常高，1978年以后调整经济结构以及统计体系，制造业比重迅速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开始与亚洲产业结构接轨，并趋于相对的稳定状态（如图12—1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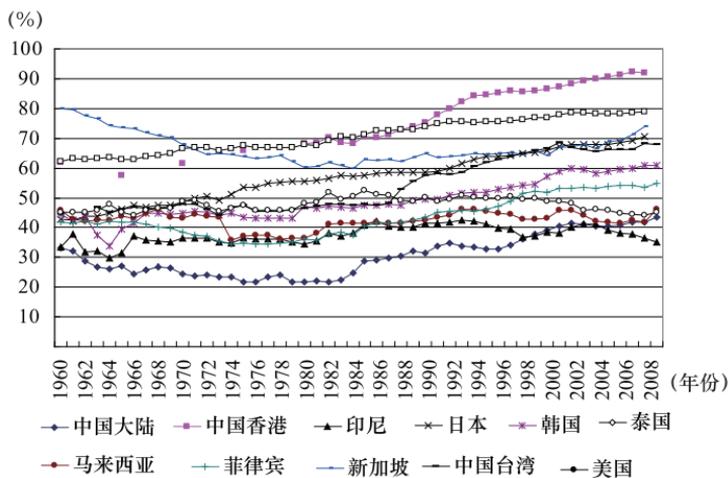


图 12—10 1960—2008 年亚太各经济体服务业的逐步发展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数据库数据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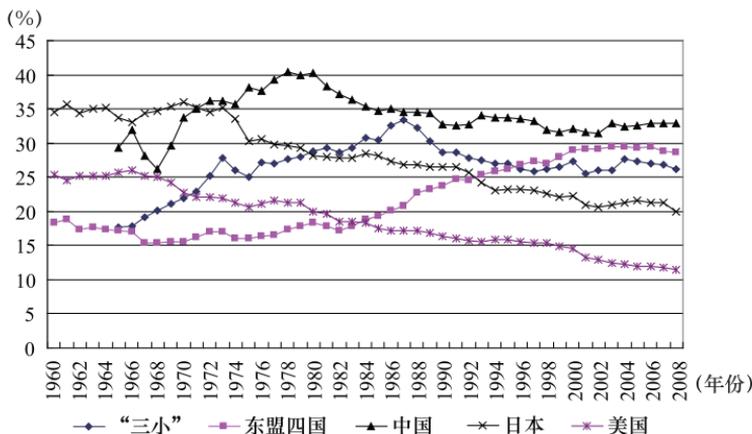


图 12—11 1960—2008 年亚太各经济体制造业比重显示的继起发展

注：“三小”为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数据库数据整理。

二 亚洲工业化路径独特性的原因探析

自资本主义工业化以来，国家主导的工业化进程已大大缩短，特别是近数十年中，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只需要20—30年的时间，既有可能基本完成工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从10%甚至更低的水平迅速上升到35%甚至更高的水平，这一过程比欧美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要短得多。这一现象常被解释为后起工业国的后发优势，它们可以利用已有的技术发展成果，节省大量的研发费用和时间。但实际上，这也说明工业或者进一步说是制造业本身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些部门的进入门槛大大降低，完成国民经济的工业化已不需要长期的各种资源的积累，只要国内与国际环境适宜，工业化有可能在很短的时期内实现。

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在现代科技水平的基础上，能够主导并拉动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产业部门是工业。其基本特征是大规模使用机械替代人工，从而大幅提升效率和质量，因而国民经济的工业化实际上是现代发达国家经济起飞的必经阶段。工业化的一般进程是工业部门首先快速发展，使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步上升；到工业化后期，工业部门停止快速增长，甚至有些国家或地区的工业部门出现萎缩，导致工业部门在经济中的地位相对下降。

亚洲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变化与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进程相似，只是亚洲国家的发展进程较快。亚洲国家或地区大部分经济体的工业化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它们的工业化进程受美欧等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进程的影响很大，其进程也与先行工业国有较大差别。

亚洲工业化启动的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先行工业化国家相继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发展阶段时出现工业的相对下降，为部分亚洲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提供了全球市场机会与资本技术支持。亚洲地区先行工业化经济体的经历大致证明了上述过程。所不同的是，亚洲先行工业化经济体并未对后进入工业化阶段的周边经济体提供相应的市场机会，因而亚洲工业生产的重要特征是一部分产品需求来自地区之外市场，简言之就是这部分生产是面向出口市场的，在这个意义上，亚洲就是一个世界的生产基地。因此，导致亚洲具有明显继起特征的区域工业化进程的根本原因是后工业化时期的工业占比相对下降，先行工业化经济体的工业占比相对下降有可能促使后进工业化经济体的工业占比上升，而后进者的工业化快速

发展又会导致再次出现工业占比的相对下降并向外传递转移，使这种循环在亚洲区域内持续发生。或者说，亚洲的工业占比相对下降伴随着对外产业转移，它对亚洲区域的经济发展与结构变化的影响不同于一个国家内的工业占比相对下降，因而需要重新审视工业占比相对下降的原因。

（一）制造业的内在特性变化

1. 制造业的成熟化大幅降低进入门槛

制造业的重大变化就是成熟化。制造业成熟化的基本含义是进入制造业的门槛已大大降低，大量制造业部门本身已被简化，它们越来越成为单纯的商品直接生产过程，原来工业生产过程中包括的许多相关环节或部门逐步与直接生产过程分离。这样，一方面，工业发达国家对这些制造业部门的垄断逐步放松，特别是对一些制造业成熟技术的控制减弱，甚至将这些技术作为可贸易的商品向外输出；另一方面，一些有一定实力的后发展国家可以比较容易地进入这些制造业部门。结果造成工业发达国家的部分制造业转移到部分发展中国家，不仅使工业国的工业比重相对下降，而且使这些发展中国家迅速完成工业化。

制造业进入门槛降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制造业的生产过程可以被充分分割，进而降低了技术门槛

制造业产品从原料到成品需要经过许多道工序，在生产过程中，原料经过物理或化学变化，最终变为可以满足人类不同需要的产品。这些工序及其发展、分割就为劳动分工提供了充分的可能，分割越细，每一个局部的、细小的过程就越单一，复杂的全过程就会变为相对简单工序的集合。生产过程越单一，就越容易提高效率，越容易将其机械化，而以机器替代人力是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的最根本途径。

生产过程的分割首先是生产工序或流程的分割。在生产工艺或技术允许或要求的范围内，将生产流程分为若干环节，这在制造业发展初期就已出现，也是劳动分工的重要基础。在每个单独的生产过程片段中，技术的复杂程度相对下降，这里的技术主要是指生产操作技术。这样就有可能使操作相对简单、统一，不仅降低了对劳动力的学习要求，而且可以逐步以机器替代人力，扩大生产规模，降低成本。同时，生产流程的可分割性也促进了劳动分工的深化，促进了技术进步，引起了许多新产品、新工艺以至新市场的出现。因此，生产流程分割是生产过程分割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内容，它的限制条件主要是技术条件的变化而不是制度的改变。

其次是生产流程与相关基础配套环节的分离。生产过程包括产品的单纯生产流程以及与其相关的配套环节，例如：与生产活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能源、原料的生产、加工、运输；为生产活动服务的基础市政建设；为生生产者提供的服务配套设施，等等，这些配套环节随着经济技术和社会组织制度的发展，随着其他部门的发展，而逐步具备了与实际生产流程分离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这种分离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如果分离可使经济或社会成本降低，那么这种分离就有可能产生，它的性质包含了更多的制度变化。

最后是生产过程中相关的直接和间接服务部门与单纯生产流程的分离。实际上，许多与生产过程相关的服务部门在企业内外都有，例如，仓储、广告、通信、研发、设计、信息处理、会计、管理等，它们也是生产成本中的重要部分，当制造业发展到成熟阶段后，以新产品带来超额利润的垄断期越来越短，很快就被模仿而进入产品的成熟期，其竞争越来越靠扩大规模、低成本，此时，减少企业内上述相关的服务部门就成为降低成本的重要途径。企业会压缩这类服务部门，尽量将对其需求转向社会，使这些内部服务部门“外部化”，利用社会上的相关部门提供服务。同时，这些服务部门逐步从企业中独立出来，在社会上形成越来越强大的服务部门，也有利于它们提高技术，发挥规模效应，降低成本，提高服务水平。

生产过程中的单纯生产流程及与其他环节的分割与剥离，使制造业的生产在时间与空间上获得了越来越大的选择范围，这也是制造业以至工业区别于农业、服务业的重要特性。农业生产要受自然条件的限制，也要受农作物生长时序的限制；服务业中许多服务产品是不可贸易的，服务的“生产”过程就是消费过程，服务的提供者与消费者往往在时间和空间上是不能分离的。这就制约了这些产业的扩散。制造业的生产过程经过充分的分割与剥离，变得越来越单纯或纯粹，企业可以只剩下与产品生产直接相关的环节甚至个别工序，这样制造业可以向更广的范围扩散，客观的限制越来越少。

(2) 社会稳定降低了国内发展阶段门槛

工业生产水平是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尽管工业生产经过分割与剥离，许多生产过程变为仅仅是单纯的商品直接生产过程，但它仍需要一定水平的社会经济环境作为必要的支持。在工业发达国家，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具备支持工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变化比较大的是发展中国家

的工业发展环境。

从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环境来看，首先是政局比较稳定。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内局势趋于稳定，没有大的政局动乱或战乱，尽管政府体制甚至社会制度各有不同，但基本上都能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相对稳定并且积极支持经济增长的政治环境。其次是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取得了较大成绩，逐步具备了较好的交通运输、通信、能源、市政（水电气等）等条件。最后是劳动力的素质不断提高，一方面是教育水平有所提高；另一方面是随着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劳动力的身体素质、健康水平等都有明显改善。这些经济发展基本条件的逐步改善，使部分发展中国家有能力接受发达国家淘汰或转移的部分制造业，有利于自身工业化的发展。

2. 生产成本成为影响制造业转移的决定因素

（1）经济边界强化导致制造业进行生产过程转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中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运动迅速发展，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批的原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新的国家疆界使相互间的人口流动受到很大限制，特别是在人口稠密地区，对劳动力流动的控制更为严格。同时，工业发达国家因收入水平很高，也对外来人口的流入设立了严格的限制制度，防止过量低收入人口流入导致社会与经济发生动乱。对低收入人口流动的限制产生的后果是，当工业化使人均收入提高时，生产的劳动成本相应上升。一旦劳动成本的上升值导致产品竞争力下降，最简单直接的提高竞争力的途径就是引入新的低成本劳动力。由于劳动力的流动成本因经济边界强化而急剧上升，一些生产企业就会因成本难以降低而被淘汰。其出路要么是进行产业升级以提高竞争力，要么就是向低成本劳动力密集的国家或地区转移。也就是说，劳动力流动的严格限制使生产过程出现大规模的转移而不是劳动力向生产地点的大规模流动。

（2）制造业依赖平均利润导致成本成为主要竞争力来源

制造业的成熟化使新产品获取垄断利润的时期越来越短，制造业的收益更多地依靠产品成熟期的平均利润。

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新产品在其成长期，因需求大于供给，产品价格较高，利润中垄断利润占较大部分。当生产能力上升使供求大致能够平衡时，产品进入成熟期，此时利润趋于平均化，企业竞争主要靠降低成

本和扩大规模。显然，成长时期长，企业获得垄断利润时间就长，这是企业收益较高的阶段。不过，随着制造业分工细化的进展，制造能力的提升和扩大使生产程序单一化、标准化，新产品的成长期可以被大大缩短，具有很强的研发能力、能够不断通过新产品获得垄断利润、竞争力很强的制造业部门数量减少，而大批的制造业是一般或普通的制造业。这些普通制造业竞争力较弱，特别是其国际竞争力弱。这并不是他们的技术能力或工艺水平差，因为这类制造业的生产技术也已基本上通用化以至全球化，而是它们的成本难以降低。因此，一般制造业更多地依赖降低成本以保持其竞争力。

(3) 产业向外转移成为寻求低成本的重要途径

由于制造业的许多直接生产过程被分割、简化，加之世界经济整体水平提高和制度环境改善，使制造业特别是普通制造业部门的能力扩张在资本、技术、原料供应、基础设施等众多方面都无根本障碍，导致其发展的资本构成趋于接近。降低成本的主要出路在于减少劳动成本和土地租金等经营类成本。显然，在发达国家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后，由于土地和劳动力是不能流动或几乎不能流动的，因此这些成本是无法降低的。在这种条件下，发达国家一般制造业或普通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难以提升，其前途是要么在国际市场上被淘汰，要么采取市场保护措施，这都是它们不愿接受的，因而向低经营成本地区转移生产就成了尚可接受的选择之一。

综上所述，当大量制造业部门因生产越来越标准化、模块化而使进入的门槛降低，发展中国家得以大量进入时，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因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流动的限制而无法降低成本，竞争力下降，甚至不得不转向海外生产，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就会逐步降低，相应导致工业以及服务业等其他产业的相对地位变化。

(二) 对外开放

亚洲国家利用世界市场来加快工业化进程，因而比其他地区率先采取了开放政策，核心是建立一套适应国际市场的制度标准，或者说按照国际市场的要求来尽可能高效地提供产品和服务。别洛孔^①认为，亚洲工业化

^① [俄] 别洛孔：《经济的开放性与经济进步——日本及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97年第1期，筱荃译，《国外财经》1997年第4期，第34—40页。

经验表明，保护贸易主义与以国外市场为导向的方针的巧妙结合可以产生辉煌的成果，随着本国（地区）生产企业的巩固，就有可能减少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干预，并通过降低关税。取消进口的非关税限制等办法实行贸易自由化。经济进步的重要条件是国家经济具有开放性，按照先进的技术和质量标准，面向世界市场并与国际分工体系一体化。

事实证明，哪个亚洲国家率先开放，哪个国家最早获益，并能够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这也是为什么亚洲国家在推行一段时期进口替代战略之后相继开始采取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而这也是拉美国家不能如亚洲国家一样顺利完成工业化任务的主要原因。

市场开放的作用，首先在于有利于解决国内工业品市场狭小的问题。当一国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时，市场成为阻碍工业化进程的主要难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亚洲普遍处于贫穷、落后状态，难以为工业部门提供资金和市场，可利用的资源主要是廉价劳动力。严立贤^①分析了中日工业化发展初期国内市场对工业化发展所起的作用，认为中国国内市场狭小限制了中国工业化早期发展，这时制度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通过开放，亚洲国家不仅解决了市场问题，同时资金和技术也相应得到解决，因而要比发达国家和其他地区以更快的速度推进工业化进程。

其次，为亚洲国家尽可能避免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主要根源在于生产过剩危机，大量产品找不到销路，因而会周期性爆发危机。亚洲工业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因为有国际市场的支持而避免了周期性危机的爆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亚洲许多国家可以保持长达二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的纪录，而同期的拉美国家却没有那么幸运。

最后，开放也减少了国内分配矛盾，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给经济带来的较大冲击。亚洲国家的开放战略实际上在国内形成两个部门，即出口部门和非出口部门。出口部门主要通过国际市场获得收益，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代替政府满足部分人口提高收入水平的要求，专心解决非出口部门的问题，缓解了政府的执政压力。当然，国际市场的风吹草动也首先冲击出口部门的企业和就业人员。但从实际来看，亚洲一直保持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这种冲击和压力只是短暂的。

^① 参见严立贤《中日两国的早期工业化与国内市场》，《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4期，第21—32页。

（三）国家的主导作用增强

产业政策是体现亚洲国家政府完成工业化进程的意志。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产业政策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其发展方向呈逐步弱化趋势，为企业提供的政策环境从倾斜的保护性政策环境逐步转向均衡的合理化政策环境。

1. 工业化初期产业政策的主要作用是降低企业成本以提高竞争力

韩国工业化初期，产业政策对企业提供支持的主要手段是对特定企业或项目实行税收、关税等方面的减免或优惠；提供财政信贷支持；提供土地等方面的优惠。总体来看，这些政策的基本功能实质上是降低企业成本，从而相对提高企业竞争力。这一思路是符合当时的情况的，韩国工业在发展初期竞争力很弱，没有技术优势，只能靠低成本竞争，包括低工资收入带来的绝对低成本和规模化生产带来的相对低成本。因而产业政策以降低成本为主要目标可以满足大多数企业的政策需求。

2. 产业政策有较强的阶段性

根据发展战略的要求，主导产业应逐步调整升级、换代转型，因而与之相关的税收、财政支持也多有时限要求。政策的主要作用期是企业建立初期，如对特定企业的税收减免大致在前2—3年内，财政信贷支持更是将企业的初建作为重点。

在工业化初期，产业政策有较强的倾斜特征，偏重于对主导产业的倾斜性支持，支持的途径是以多种方式降低企业成本而不是提升其技术能力，即使是技术支持也是提供财政支持以引进技术而不是增加研发投入；随工业化的发展，产业政策的倾斜性逐步降低，如重视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增加财政对研发的支持，等等。

3. 产业政策的发展方向是逐步弱化

随着产业政策倾斜性的降低，产业政策的独立性也逐步模糊，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更多地靠宏观政策的调整而不是靠微观政策制度环境的塑造。不过，这种政策调整的效果显现较慢，突出的例子是韩国大企业在工业化初期的政策支持下已有强势发展，尽管韩国政府对大企业已不断采取抑制措施，也颁布了反垄断法，但大企业在经济中的作用至今仍十分突出，宏观经济的运行受大企业的影响仍较大。不过，就政策层面来说，政府对大企业的支持已远不及工业化初期。

例如，韩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以政府为主导，其特点是政府规划、指

导、管理、调控经济的发展进程。显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范围很广泛，实际上也很深入。但是，政府的主导能力从何而来？韩国在工业化初期发展水平很低，政府和国民经济要靠大量的外援才能运转，显然政府本身并不具备全面主导和干预经济的能力或实力。

上述地缘战略地位转换而成的经济资源是政府能够主导经济发展进程的重要条件。政府从这种地位中获得政治合法性，同时也从中获得干预以至主导经济发展的能力或合理性。韩国的特殊或成功之处在于这种地缘战略地位在其工业化全程中一直保持未变，因而这种特有资源对政府主导性的支持也就长期存在并发挥作用。

韩国的经历表明，其政府并不是仅靠集权就能主导经济发展，政府是从地缘战略位置获得了额外的经济资源，这种转换而来的资源不仅支持了政府对经济的主导，而且支持了政府的集权。因此，韩国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是有其经济基础和经济合理性的，它并非仅靠集权就可获得与保持。

4. 主导产业的选择

主导产业选择模式虽然可以使目标产业迅速扩大规模发展起来，但不能以同样的速度扩大相应产品的消费市场规模，况且这类倾斜发展的产业对整体经济结构来说本来就是相对单一而集中的，因此它们的高速扩张与发展必然导致生产与市场的脱节。也就是说，生产与消费的不匹配是这种倾斜发展的产业选择模式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对政府选定的主导产业来说，足够的市场规模是其顺利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从国内市场来看，上述倾斜产业结构形成的生产与消费矛盾是无法解决的，迁就哪一方都会使生产高速增长难以为继：压缩生产适应消费规模将直接导致增长速度下降；而充分生产则将直接导致生产过剩，同样会迫使生产停滞。因而寻求外部市场就成为这种倾斜型产业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在外部市场规模允许的条件下，生产可以充分扩张，在其带动下，经济可以持续高增长，从而避免了单一国家内工业化进程中难以回避的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商业循环（经济危机）。例如：韩国以人力资源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导资源，就必须寻求能够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产业并优先发展之。在工业化初期，韩国选择了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后逐步进行产业升级，将主导产业逐步转向重化工业、汽车、电子等产业。这些产业特点一方面是对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不断提升；一方面是其政府在倾斜配置资

源的支持下可以迅速扩大规模，借规模优势而获得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这一发展的产业选择模式将人力资源持续升级与产业持续升级结合在一起，成为韩国工业化上升期的主要带动力量，使其对整体经济保持了较长时期的带动作用。

（四）国际环境稳定

从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环境来看，首先是国际安全环境基本保持稳定，没有发生世界规模的战争。尽管曾有大的国际战略格局变化，但它是向减少战争威胁的方向发展，是向舒缓国家间关系的方向发展，这为发展中国家全力发展经济提供了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即便是在冷战的持续对峙中，只要不爆发战争，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可利用其战略地位换取相应的经济利益。

其次是国际贸易环境改善，疏通了国际商品流通渠道。从关贸总协定（GATT）到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多轮谈判，大幅度降低了国际商品贸易的关税，发达国家的工业品关税从30%以上降到了5%以下，这样就使工业品的主要市场基本开放，为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打开了市场大门。同时，世界市场的逐步形成与扩展，使各种资源产品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较为通畅地流动，生产企业可以较及时而稳定地从世界市场上获取所需的资源，基本摆脱了资源供给的制约。此外，随着新技术、新材料的不断出现，世界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呈下降趋势，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后，石油价格的暴涨引发资源价格的上升，工业化国家为降低成本而开发出大量可降低消耗的新技术，导致大量节约自然资源的新工艺、新产品、新材料迅速出现，并以此形成了一批新兴产业，使世界工业和经济发展受资源的约束相对降低，世界市场的自然资源价格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基本呈下降趋势。

最后是世界资本市场上资本流量与流速都在增长。制造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当其竞争力下降而收缩时，使大量资本从生产过程中析出，由于服务业生产率低于制造业，对资本的吸引力和吸纳能力较低，因而工业化国家在制造业产值下降的同时，投资率也在下降。此时，大量向海外投资就成了这些资本的重要出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外来资本大大缓解了它们因工业化而产生的对资本的强烈需求，为吸引外资，发展中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实施资本市场开放政策，降低或清除了对外国资本进入所设置的屏障。

三 目前亚洲工业化进程的“殊途同归”与不彻底性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国家纷纷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以促进工业化路径转型。通过对国别的分析，可以发现，尽管各国工业化路径转型的起点不同，但是各国均在转向内外需共同推动工业化进程或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见表 12—9）。

表 12—9 亚洲各国工业化路径转轨方向

国 家	是否大国	是否完成工业化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日本	大国	完成	外需主导	内外需主导
韩国	小国	完成	外需主导	启动内需
印度尼西亚	大国	未完成	内需主导	内外需主导
马来西亚	小国	半完成	外需主导	外需主导减弱
泰国	小国	未完成	外需主导	双轨
菲律宾	小国	半完成	内需主导	内外需主导
越南	小国	未完成	外需主导	内外需主导
印度	大国	未完成	内需主导	内外需主导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目前，亚洲还不完全具备依靠内需市场拉动经济增长的条件，亚洲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路径在短期内不可能有较大的调整，外需仍是亚洲未来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动力之一。亚洲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路径的典型表现是出口依存度较高，这一态势保持至今，即使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多数亚洲国家仍如此（如图 12—12 所示）。变化较大的是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出口依存度呈倒 U 形，中国和马来西亚的转折点是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是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其他亚洲国家则继续保持出口依存度上升态势。这些国家中，部分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试图调整其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路径，但效果不大。例如，2001 年泰国政府较早地提出了新的调整战略，即将国家的发展从依赖出口转向内需主导增长的轨道，但实际上泰国的发展战略调整是一种双轨战略，既依赖外需也依赖内需，泰国出口依存度依然保持走高之势。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亚洲国家仍把扩大

出口当作应对金融危机的主要措施之一。例如，日本提出要加强与中国等亚洲邻国的经贸关系，扩大亚洲内部需求。印度尼西亚则为寻求新兴出口市场，目标首先定位于亚洲及中东地区。韩国力图成为世界出口大国前八强，将开拓以中国等二十国集团为中心的新兴市场。中国则一方面调整外贸结构，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努力保住传统市场；另一方面深入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大力开拓新兴市场。

客观地说，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相比，亚洲内部市场规模仍略显逊色。由于亚洲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整体不高，亚洲内需市场规模，尤其是私人消费市场规模还不可能达到欧盟和北美的水平，也就不可能完全取代外需市场。2010年，本书所指的亚洲9个国家GDP规模相当于美国的90%以上，但是私人消费却只相当于美国私人消费的60%左右。反映在出口结构上，亚洲在短期内也难以有较大的改变。亚洲出口到自身的产品仍以中间产品为主，而出口到区外的则以最终产品为主，无论是产品出口结构，还是产品出口市场，都变化不大，而在未来一定时期内上述结构发生逆转也是不易的（如图12—13所示）。另外，亚洲地区一体化水平有限，还未达到欧盟等地区的水平，2009年亚洲国家间的贸易规模占该地区全部对外贸易额的52%，而欧盟这一水平为70%以上，这表明亚洲区内市场规模仍与欧盟等发达地区存在较大的差距，在未来一定时期内亚洲仍需要外部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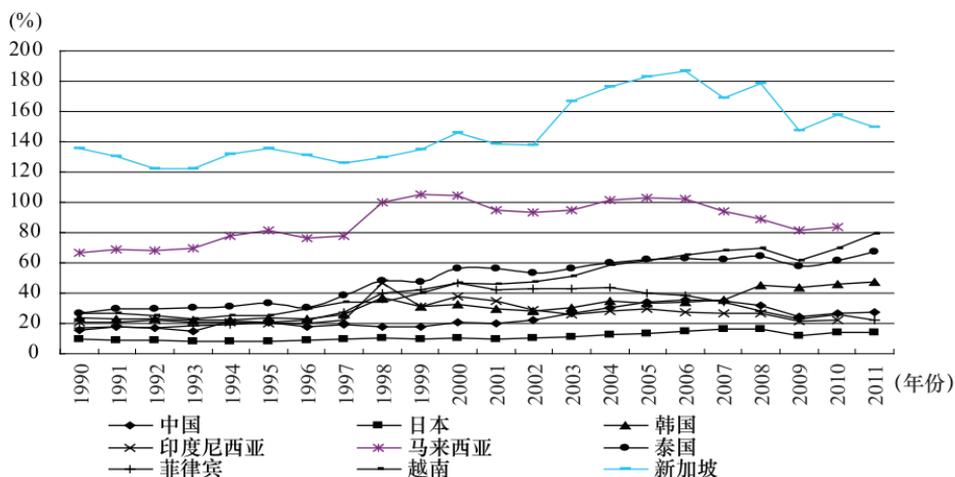


图 12—12 1990—2011 年亚洲国家出口依存度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数据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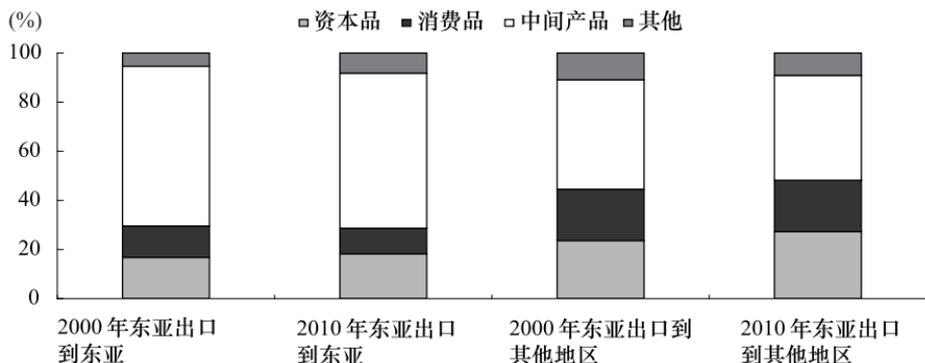


图 12—13 亚洲产业出口市场及出口结构

注：产品分类按联合国 BEC 标准。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数据库（<http://comtrade.un.org/db/>）。

此外，崛起中的亚洲市场力量也确保了更多后起国家能够继续推行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路径，也就是说，亚洲建立自己的内需市场不排斥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路径的继续推行。目前，亚洲人均收入水平提升已经为自身的市场扩张创造了基本条件。在过去的 10 多年中，亚洲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很快。2000 年，本书所指的亚洲 9 个国家人均 GDP 低于 1000 美元的还有 3 个成员，即中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经过近些年的快速增长，2010 年人均 GDP 均超过 1000 美元，迈入中低收入以上的行列中。人均收入的提高不仅扩大了需求规模，同时也促使亚洲私人消费结构发生转型，由过去满足于基本生活需要的产品消费向具有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品或服务消费转移，这为推动地区市场建立和发展创造了初始条件。正因如此，2009 年中国摆脱危机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是国内消费和投资，而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①

亚洲新兴市场的兴起，客观上促使亚洲出口方向发生转变，确保了后起国家继续推行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路径。如表 12—10 所示，就全部产品出口而言，2000—2010 年间，亚洲 9 国出口到欧美等发达市场的产品比重在下降，出口到自身的比重维持不变，但出口到世界其他地区的比重在上升，这表明亚洲国家的出口市场在走向多元化。再就具体产品而言，由于

^①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09 年 GDP 增长的主要拉动力是最终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总额，分别拉动 GDP 增长 4.6 个和 8 个百分点，而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拉动为 -3.9 个百分点。

消费品和资本品属于最终产品，这两部分产品的出口方向变化更能表示一国出口模式的变化，亚洲九国出口到美欧等发达国家占全部出口的比重在下降，而出口到亚洲自身的比重维持不变，出口到世界其他地区的比重在上升（见表 12—10）。

表 12—10 亚洲国家对世界的出口结构（以世界为 100） 单位：%

年份	全部产品				消费品				资本品			
	美国	欧盟	亚洲	其他地区	美国	欧盟	亚洲	其他地区	美国	欧盟	亚洲	其他地区
2000	23.6	14.3	38.4	23.7	29.0	16.3	27.7	27.0	26.3	19.0	30.9	23.9
2005	19.0	13.7	38.7	28.6	27.9	18.1	23.6	30.5	22.1	17.8	29.7	30.4
2010	14.3	12.1	38.2	35.4	23.0	17.6	24.1	35.3	16.6	14.3	29.0	40.1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数据库。

随着亚洲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亚洲国家内需和外需两部分日益高度融合，亚洲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路径将与内需导向型工业化路径共存于亚洲国家之中，共同助力完成工业化任务。

四 亚洲工业化道路：转型与前景

进入 21 世纪以来，特别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以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为主导的亚洲工业化道路开始面临一系列挑战，其中最主要的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市场压力，使得亚洲工业化道路呈现新的变化趋势。

（一）亚洲工业化道路分化与中小型国家对亚洲工业化道路的“继承”

当今世界经济运行的基本矛盾是世界市场有限性与生产过剩之间的矛盾，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是这一矛盾的外在反映。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Cline^① 对国际市场需求约束，即主要是发达国家市场需求约束的负面影响进行过实证分析。Klein^② 也注意到，如果发达国家市场被充分挖掘，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将越来越难以被发展中国家作为增长的主要路径所采

① Cline, William R., "Can the East Asian Model of Development be Generalized?", *World Development*, 1982, Vol. 24.

② Klein, Lawrence R., "Can Export - Led Growth Continue Indefinitely? An Asia - Pacific Perspective",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1990, No. 1, pp. 1 - 12.

用。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经济格局已经被大大改写，发达国家经济实力下降趋势更加明显，能够为亚洲不发达国家提供消费品市场的能力日益有限。以美国为例，美国从亚洲进口占其全部进口的比重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 40% 左右逐步下降到目前的 35% 左右。同时，随着发达国家逐步向后工业社会转型，能够向外转移的工业部门也已大大减少。再有，当前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再工业化”的战略，试图将部分产业移回国内，这也势必影响亚洲国家的工业化继续推进。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史来看，亚洲工业化道路离不开工业国的“支持”，特别是市场的支持。然而，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的下降和亚洲经济实力的崛起，特别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发达国家很难继续像以往那样为尚未完成工业化的亚洲国家提供良好的条件和机会，特别是市场需求方面，这使得亚洲不发达国家工业化道路面临再度寻求出路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工业品市场出路问题。

尽管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给亚洲工业化模式带来新的挑战，但这并不是说以出口导向型战略为主导的亚洲工业化道路失效，一些后起的亚洲不发达国家仍然可以继续采用此种模式。这是因为，首先，那些从不发达国家转型为发达经济体的亚洲国家可以像传统工业国那样，继续向其他不发达亚洲国家转移产业，进而完成工业化所必须进行的产业基础积累。事实上，这一进程从未中断过。^① 其次，亚洲不发达国家多为“中小”型国家，工业化所需要的市场规模比较容易达到，特别是随着亚洲合作进程的加快，区内市场正在逐步走向统一，正在取代区外市场而起作用。这样，中小型国家所需要的消费市场部分可以从亚洲区内获得满足，也有助于后起中小型国家完成工业化任务。最后，不发达国家近期纷纷调整国内政策，改革不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政策措施，以加快本国的工业化进程。比如，缅甸在修改投资法，以有利于外资的进入。表 12—11 表明亚洲部分不发达国家仍在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后起国家在推行出口导向战略时面临的外部风险也在加大。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发布的《2014 世界经济展望》中强调，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不确定因素将

^① 即通常所说的“雁形模式”，产业部门不断从亚洲发达国家向落后国家转移，形成类似大雁飞行的样子。

加剧新兴经济体的风险。

表 12—11 部分亚洲国家经济增长率、出口占 GDP 比重变化 单位:%

国 家	GDP 年均增长率		出口占 GDP 变化			
	2003—2008	2008—2013	2000	2005	2010	2013
泰国	4.7	2.9	64.8	68.6	66.6	70.1
马来西亚	5.7	4.2	119.8	112.9	93.3	82.9
越南	7.0	5.7	55.0	63.7	72.0	83.9
孟加拉国	6.2	6.1	14.0	16.6	16	19.5
印度	8.0	6.9	13.2	19.3	22.0	24.9
印度尼西亚	5.7	5.9	41.0	34.1	24.6	23.7
菲律宾	5.5	5.2	51.4	46.1	34.8	27.9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二) 中国等亚洲大国工业化道路的转型与经济增长的“新常态”

如果说亚洲中小型不发达国家尚有可能延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模式，对于中国、印度尼西亚等地区大国而言，则有不现实的成分，或者说，亚洲大国未来的工业化道路将既不是自力更生型，也不是完全的“依附”型，而是在内外需市场共同拉动下实现工业化目标。

以中国为例。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后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工业化路径，改革开放前是自力更生型，改革开放后走的是亚洲先行发达经济体的工业化道路，即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一方面，利用发达国家不断进行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等产业，形成具有带动中国国内经济增长效应的大规模的出口产业部门；另一方面，在国内市场尚未充分发展的前提下，利用发达国家因产业转移而留下的产品需求空间，通过外部实现供求平衡，在不长的时期内，迅速成为世界制造大国、制成品出口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目前，中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正在向工业化的中高级阶段过渡，但是继续依靠外部市场已难以完成工业化。在过去，中国对外开放水平低，相对于国际市场，中国属于“贸易小国”，虽然中国对外出口一直在增长，但是仍在发达国家市场容量的承受范围内。随着中国出口规模的持续扩大，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限制开始趋于增加，典型的反

应是贸易摩擦案件增多，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要求包括中国等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再平衡的论调尤为突出。就内需而言，中国还不是一个消费大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13年，中国GDP规模已经相当于美国的55%，但是国内消费规模不及美国的1/3。也就是说，相对于中国所具有的制造规模和出口能力，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市场越来越难以容纳中国制造的出口产品，而国内消费还难以完全承载目前的生产规模，这是今后甚至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

为稳定中国工业化中后期进程和经济发展，新一届领导人已经作出重大的战略调整，一方面通过推进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分配体制，将经济增长的红利更多地惠及民众，进而刺激国内市场规模的快速扩张，主动实现供求平衡；另一方面，在外部市场规模有限和结构固化的情况下，构建统一的地区和世界市场。

目前，中国正在迈向经济发展“新常态”。所谓的新常态是针对过去的发展模式而提出的，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向未来延伸的必然，届时中国经济结构将发生全新的变化，如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将从过去依靠数量型转变为质量型，拉动经济增长的力量由外需转为内需和由投资转为消费，经济制度也更加向世界开放，等等。与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轨迹相比较，一些新的迹象也已显现。根据官方数据，近20年来，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62%下降到2010年的47%，但最近几年这一比重开始逐步回升，2012年已超过投资。另一个变化是2013年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

（三）对亚洲工业化道路的评价

亚洲所走的工业化新路是工业国工业化必然向世界拓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科学地预言了工业化发展的最终趋势是世界将走向一个有机互动的整体，“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做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①。

应该说，工业国向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转移工业部门是世界工业史上新近出现的现象，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内部矛盾外化的结果，也同时给发展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0页。

中国或地区发展工业化创造了新的机会。尽管当时的主要工业国在世界上占有强势或主导地位，控制着世界市场、资源、技术等重要生产要素，似乎对那些想重复工业国发展老路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不留有任何机会，比如中国、印度，如果要重复工业国发展老路，就不得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推行计划经济。但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预言的那样，资本的逐利性也同时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体系的破坏力量，加上技术进步，使得工业化得以超越工业国控制的范围，向不发达国家延伸。正是这种新的“历史机遇”，使亚洲发展中国家能够以“跨越式”的方式完成工业化进程，并实现经济的跃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就是上述实践的结果。

当然，由于起步不同，亚洲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工业化道路不是全盘照抄，而是有较大的“修正”。修正的主要原因是国情不同。亚洲发展中国家启动工业化进程的条件千差万别，有的需要资金，有的需要市场，有的需要技术，有的需要资源，有的是综合需要，也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其次是国际地位的“差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大阵营的对立使得许多不发达国家被迫“选边”站，那些被发达国家认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发展中国家率先赢得了发展机会。亚洲诸多国家当时被美国认为是围堵社会主义阵营的“前沿”阵地，也因此获得了美国包括资金、市场等多方面的援助。最后是主观能动性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动员能力也往往决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快慢，包括土地改革、资本积累以及政府动员其他社会资源的能力，等等。这也是我们看到即使在已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工业化运动的亚洲地区，国家间仍存在较大的发展差距的原因之一。从这里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修正”不是不遵从工业化内在发展的变化规律，而是尽可能满足工业化进程的基本条件。

在工业文明已经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的亚洲经验有：第一，走工业化道路的国家需要学会做到内外互动，才能更好、更快地完成工业化目标；第二，市场是最终制约一国工业化进程的主要因素；第三，国家的能动作用不可忽视，且在一国工业化中往往起决定性作用。

五 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在当代仍具有现实价值和指导意义。

首先，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是一个全面、系统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是对工业化运动过程一般规律的探索，揭示的是工业文明逐步走向世界并在世界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过程，因而马克思主义的工业化理论从未失效过，对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仍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其次，与西方工业化理论比较，马克思主义更注重对工业化进程的规律性探索，做定性分析，而西方工业化理论更注重定量分析。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早期发展经济学曾广泛应用划分不同发展阶段的方法来描述经济发展过程，比较著名的是罗斯托的经济发展五阶段理论、钱纳里的三阶段论，以及贝尔的三阶段论，等等。这主要是由于西方工业化理论是在工业化已经获得充分发展之后所进行的总结性理论。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则基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角度，看到了工业化在其中的根本性作用，因而演绎出一套较完整的工业化理论体系，并探讨了工业化发展的基本要素如市场、技术、土地、国家等在经济体系运转中的基本作用和不同历史时期基本矛盾的不同表现。

最后，马克思工业化理论是一个动态理论，是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理论，这一过程至今并没有停止。只要世界上仍有不发达国家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就有可能获得新的提升。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对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并没有进行全面分析，但是战后亚洲工业化实践恰恰反映出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再有，尽管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看到了不发达国家是在西方工业化已经确立的背景下进行的，但是对于如何利用外部提供的包括市场、资本、资源等在内的有利条件，走出一条工业化新路，却并没有给出答案，可以说，亚洲工业化实践补充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特别是关于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理论的部分内涵。

总之，工业文明是属于全人类的文明成果，从来不会——将来也不会——停滞在某个阶段、某个国家，当今的任务主要是解决工业文明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兴起和发展，亚洲的工业化实践也恰好提供了工业文明向世界延伸的新模式，也就是说，工业文明不仅能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同样也不会给发展中国家设置任何限定发展的障碍。如果我们将这一过程

看作一种静态、孤立的过程，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是联系、发展、矛盾的”的基本原理，也不利于我们对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经济发展进程的认知。